

二

伪满地方殖民政权

抗日战争纪念馆

抗日战争图书馆

日伪统治奉天十四年

齐守成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策划，在沈阳（奉天）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我国东北大好河山，完全践踏于关东军的铁蹄之下，而且于1932年3月，炮制出一个所谓的“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操纵下，实行法西斯高压统治和军事镇压，进行疯狂掠夺。同时，大搞以摧残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殖民地文化，时间长达14年之久。

炮制傀儡政权 实行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奉天）后，积极筹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奉天省公署”、“奉天市公署”，在城乡遍设区、乡、村公所。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侵华战犯元凶土肥原贤二还亲自首任伪奉天市长。据1940年伪《奉天要览》统计，在伪奉天市政府任职的825名官吏中，日本官吏就有509名，占62%。日本官吏不仅人数上占多数，而且把持了各部门的实际大权，少数汉奸也只不过是装饰点缀的牌位而已。伪行政机构设立后，为实行殖民统治，公布取消使用“中华”和“辽宁”字样，禁悬中国地图，公布指纹法特令等。

为了巩固伪政权，镇压反抗，扩张侵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从旅大迁到沈阳，并在沈阳驻扎大量军队。据伪《盛京时报》1932年9月刊载，当时驻伪奉天省日军“警备总兵力，步

兵20余营，骑炮多连”，后在沈阳又增设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为王之佑，实际大权是日人顾问原和三郎，在重要军工厂均驻防日军，如“九一八部队”“五八一部队”等二十多个。至日军战败时，驻沈阳日军就有后宫淳大将的第三方面军、本乡义夫中将的第四十四军、岸川健一中将的第六十三师团、中山樗中将的一三六师团、桑田贞二少将的独立混成一三〇旅团、阿野安理少将的独立战车第一旅团。这些日军以“讨伐”、“剿匪”为名，大肆逮捕和屠杀我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监视和镇压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仅据伪《盛京时报》1934年1月23日载：1933年，奉天省警备司令部出动485次，其中8月份就出动84次，打死我抗日志士及人民群众1749名，打伤2200多名。

同时，在沈阳大量设置警、宪、特务机关和监狱，实行法西斯专制。诸如设立了奉天陆军特务机关、关东军情报部奉天支部等大量的特务组织，其中设在沈阳的伪奉天地方保安局，以“姜满洋行”为掩护，有9个特谍班，40余人。城内育美屋书店、劝业商场内之秋江书店、协和街前美国领事馆址均为特务据点。北陵国际观光旅馆、千代田大街瓦尔瓦露西亚饭店、住吉街奉天大楼“此之花”豆腐馆、私烟馆等则为秘密联络点。另外在加茂街的“敷岛寮”和北陵警察学校内均设有秘密监狱。在这些特务组织中任职的间谍特务分子数以万计，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网，专事捕杀我爱国志士，实行法西斯残酷统治。

就警察来讲，在沈阳先后设有伪“奉天领事馆警察署”、“奉天市警察署”、“奉天市警察厅”。在“奉天市警察厅”下又设24个区警察署和138个街、村警察分驻所，在市内各主要工厂都设有警防课（系）。这里特别要提到宪兵。伪满期间，日伪军警联合进行的屠杀与镇压中国人民的暴行，无不有关东军宪兵队参加，而且都处于核心和指挥地位。众所周知的日本甲级

战犯东条英机，就曾担任过关东军宪兵队的司令官。

这些日伪军、警、宪、特的五花八门反动组织还给沈阳人民制造了种种罪名，什么“思想犯”、“经济犯”、“国事犯”、“嫌疑犯”、“反满抗日罪”、“内乱罪”……五十多种，以此来任意残杀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的14年中，制造大规模血腥镇压我党地工、爱国志士及人民群众的大事件达40余起。据伪“奉天省警务厅”1936年的报告中记载，这一年內即捕杀我爱国志士和居民19 623名，仅一个“桃园工作”事件就捕杀318名。

血腥屠杀 残酷镇压

伪“奉天市警察厅”特务科长筑古章造，在他任职期间就抓捕中国人530名，杀死百余人。伪“奉天铁西警察署”署长中园秀雄，在他任职3年中，就捕杀我中国居民2 930人。他们为了大量拘禁中国人民，在沈阳设立了伪奉天第一监狱、陆军监狱、兴农合作社等公开、秘密监狱和拘留所、看守所近五十多个。其中，仅伪“奉天第一监狱”就经常拘押中国人民二千多名，绝大部分人有去无回。沈阳东陵区有个贫农老汉无端被抓至该监狱，在狱中他的右腿骨被打断，日伪看守竟然割开他的皮肉，用铁丝将断骨缠绕，把他活活折磨死去。

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抓捕中国人民之后，施用各种非人刑法，除毒打、灌凉水外，还有灌煤油、灌辣椒水、烙铁烙、蜡烧、开水浇、滚钉笼等。杀人也是多种多样，有枪杀、刺杀、刀砍、铡刀铡、活埋、绞死、喂狼狗、开膛破肚、活体解剖、细菌试验等等。1939年日本宪兵队在沈阳抓捕中国人13名，刑讯后，均送到石井部队进行细菌试验而屠杀。1941年，日本特务机关先后将18名中国爱国志士押到南满医科大学，交给该校的

日本教授做活体解剖，并且还写出《中国人脑的组织学研究》等论文，发表在日本仙台大学学报上。

沈阳的大东区老瓜堡子，日伪时曾在该地设立“奉天矫正辅导院”。这个矫正院，实际是个杀人魔窟，关押的都是些被敌伪任意抓来的无辜百姓，天天遭到毒刑拷打，每日都成车往外拉死尸。日寇对想逃跑的人更是惨无人道，抓回后有的被绑在杆子上，先从头上浇开水，然后用布缠起来浇上汽油点“天灯”。有的被绑在一棵枯树上活扒了皮。

垄断工商企业 掠夺经济资源

1906年，“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对沈阳进行政治和经济渗透，沈阳成为日本在东北投资的五大中心之一。据统计，1926年沈阳的24家近代工厂中就有11家是日本投资。到1927年，日本在沈阳的投资达4570万日元，开公司150个，其中拥有100万元资本以上的大公司17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等大财阀，进一步垄断了沈阳的经济命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奉天工业总资金中所占的比重达97%，商业达73%。

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开办的企业，利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如当时在沈阳的“满洲飞行机制造株式会社”、“奉天造兵所”、“满洲火药工业株式会社”、“满洲铸物株式会社”……都是直接为关东军服务的。一些机械制造业，也完全是日本机械工业的附庸，不能生产成套设备，只能修修配配。一些轻工业，如“满麻奉天工厂”生产的麻袋，是专门用来掠夺中国农产品用的，“亚细亚麦酒株式会社”生产的啤酒，是专门供应关东军及运往日本国内的。工人如喝几口啤酒，有的被毒打致死。日本帝国主义各大财阀在

沈阳经营的工厂企业，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掠夺我国经济资源，攫取高额利润的基地。他们把在沈阳掠夺的财富，大量运往本国，如煤、铁、大豆等物资，1943年为350万吨，1944年为450万吨。

同时，为了缓和他们国内的经济危机，大肆倾销日货，当时在沈阳市内的商品70%均是日本产品。沈阳的四大百货公司，其中有三家是日本人开办的。零售商店有一千五百多家。为了独霸沈阳市场，对待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竭力进行迫害和摧残。“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城内中国工商业者休业逃亡的达1500余家。城内中街（四平街）中央百货公司的三层大楼竟变成了一个煎饼铺。即使这样，还由于粮食配给的不足，甚而“统制”以致连煎饼铺也开不成了。沈阳的“同昌行”，当时生产一种“老火车头”牌牙粉，物美价廉，深受沈阳人民所喜爱，这也恼怒了日寇，1932年3月将老板刘凯平抓到日本宪兵队严刑毒打，以反满抗日的罪名处死。

敲骨吸髓 生灵涂炭

在日伪统治下的沈阳各工厂、企业的经营管理及技术大权，全由日本侵略者所掌握。如“满铁奉天车辆株式会社”、“亚细亚麦酒株式会社”，从经理、技师，到每个科、股、班长、事务员都由日本人担任。中国人除少数汉奸工头外，工人们每天要劳动12个小时以上，可所得工资连家人都养活不了。日伪统治者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在各工厂中大量雇用童工，被贫困逼迫自幼就出卖劳动力的中国童工，都要同大人一样的干活，但所得工资都不及日本人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少的可怜。据1935年《满洲国现势》记载，1934年沈阳市的中国工人同日本工人日工资比较：力工日本人为2.5元，中国人为0.7元；铁工种日

本人为3.6元，而中国人却是1.4元，相差极为悬殊。就是这样微薄的工资，还要遭到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受到工头、军警的敲诈勒索。据1943年出版的《奉天市要览》统计，在1935年沈阳市征收的税款总数是459 000元，平均沈阳市民每人0.88元，至1942年，税款总数上升为2 120万余元，平均每人13元之多。1942年与1935年相比增加46倍，平均沈阳每人缴纳的捐税，增加15.7倍，日伪当时收缴的捐税即有二十多种。除一般的营业税、所得税、人头税、家屋税之外，还有什么“畜犬捐”，不论饲养鸡鸭猪狗都要交税，养狗一头1932年纳税1.2元，到1942年增为6元。当时就是给别人当个佣人也要缴纳“佣人捐”。在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的同时，日伪统治者还大肆发行“公债”，按人分派，逼迫沈阳劳动人民去认购。

中国劳动人民除在经济上遭受穷凶极恶的压榨盘剥，尤其是处处受到歧视迫害，任意鞭打残杀当牛做马，生命安全毫无保障。如当时的中国工人上下班都要给日本侵略者行礼，有的工厂上下班时中国工人不能和日本人走一个门，也不能上一个厕所。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沈阳工厂企业，是日本侵略者作威作福的乐园，是中国工人的暗无天日的活地狱。在日伪统治下的“奉天纺织株式会社”，对工人有“三十八打”比如谈论国事打、交头接耳打、听不懂日本话的打、挨打不耐烦打……有个童工，由于年岁小，劳累过度，有一天该童工上夜班打了一会瞌睡，被日本工头森奇发现后，即指使狗腿子用棍棒将其活活打死。此外，还规定出什么“旷工一日罚工三日”、“旷工三日立即除名”，“女工有了小孩就开除”等“三十二罚”以奴役中国工人。

1941年冬，在伪“奉天住友金属株式会社”炼钢厂内有个天车工，因连续干了三天三夜，刚在平炉后面坐下来休息一会

儿，被日本工头山本发现，这个恶魔竟舀起一勺钢水泼到中国工人身上，活活地烫烧致死。

在奉天第一机械工厂的日本守卫警长合本井藏，肆意残杀中国工人，他将工人浑身扒光，吊在厂内的老杨树上，用电线拧成的鞭子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用五个大气压的风管，插入工人的耳朵里，直吹得七窍出血当场死去。有的工人被他吊打后往身上浇凉水，寒冬里埋在雪堆里活活冻死。而这个杀人魔鬼还说什么：“满洲人大大的有，死了的没关系”。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设立“济生院”，后改名“勤劳辅导训练所”，专门作为抓捕输送劳工的转运站。日伪的宪兵、警察经常出动，以抓捕什么“浮浪者”为名，到处抓捕沈阳行人及老百姓居民，然后押到训练所登记编班送往矿山和军事工程当劳工。这些被抓去的数以万计劳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绝大多数是有去无回，每一个劳工营都是一座人间活地狱。在所谓的“共荣庄”之类的劳工营里，劳工们遭受着劳累、毒打、饥饿和传染病的袭击，随时都和死神作伴，而日本帝国主义准备的是万人坑。

日本帝国主义在抓劳工的同时，还大抓所谓的“经济犯”。中国人种大米可不准吃大米，否则就是“经济犯”。据1942年1月《盛京时报》刊，1941年奉天市警察局经济保安科办理的经济犯案件，即有4778件，抓捕沈阳无辜人民一千五百多人。如在大东区老瓜堡居住的一位孙大娘，有一天他丈夫和三位老客因吃一顿大米饭，后被日伪军警发现了大米粒，当即将其都抓至“奉天矫正辅导院”均被活活处死，孙大娘的两个孩子也被惊吓而死，一顿大米饭弄的家破人亡。

另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期间，修公路、开工厂、建兵营，任意霸占中国农民的土地。于洪区丁香屯原有土地七千

多亩，在1937年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逼卖五千多亩，修建了关东军“蹄铁厂”、“航校”。1943年，关东军修建飞机场，强占奉集堡、下庙子、皮家湾等村的土地三千多亩，当时正值秋天，庄稼快要成熟之际，就全部被毁坏掉，使沈阳大批农民衣食无着、流离失所。有的被逼身亡。更甚者，日寇不但霸占土地，还向广大贫苦农民征收高额出荷粮。农民一年用血汗换米的一点粮食还要拿出一半或四分之三去交出荷粮，可日伪把大量的粮食搜刮去，却在沈阳城乡实行粮食配给，一个成年人每月只能分到不足10公斤的粮吃，其中大都又是豆饼、榆子面之类，至使沈阳人民终年遭受饥饿折磨，挣扎在死亡线上。

推行奴化教育 灌输“日满一体”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后，竭力推行奴化教育。首先，封闭一切原有的学校，在日本人主持下，先后成立了“伪教育筹备委员会”、“奉天省教育厅”。重新组建日满学校，派日本人当校长、训导主任、教员等对中国师生进行监督。废除原有教材，采用日本人及汉奸文人编纂的，灌输“日满一体”、“同文同种”、“王道乐土”等一系列的亡国奴货色。这些教材是只讲满洲国史、东洋史，不讲中国史，只讲满洲国地理，不讲中国地理，从教材中取消了中国这个观念，妄图使中国的下一代不知道自己的祖国，忘掉是个中国人，永远做日本统治者的“顺民”、“良民”。

为了彻底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中国学生忘记自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日伪教育机关，强行规定日语和满语同为国语，而在实际教学中则以日语为主。中国学生从小学就要上日语课，当时的“国高”不仅每周要用许多课时学日语，而且一些课程的教材皆用日文印成，在讲课时以日语讲解。当时凡

中等学校，每年都举行两次日语鉴定，鉴定合格者分等给予津贴，毕业时并给以升学和就业的“优待”。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永远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不仅进行奴化教育，并且执行愚民政策。沈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14年期间，大中小学校只增设19所（原为51所后为70所），这增加的19所，除了一所高等学校外，其余均为小学校，这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的阴险用心，这就是从小给中国青少年心灵中播上奴化种子，限制发展中高等教育，妄图使中国人永远做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奴仆。

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奴化教育的手段是花招多样，他们在学校里大讲什么“修身”课、“国民道德”课，宣扬“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并按照他们进行侵略奴役的需要，还提倡什么“尊君”、“善邻”、“博爱”、“孝行”、“礼义”之类，以此来束缚和麻痹中国学生的思想。同时，强迫中国学生天天念诏书，遥拜日本天皇，大力培植奴隶意识。

与此同时，对中国师生的思想活动严加监视，各学校里的日本校长或教职员，都和日本宪兵特务机关有联系，发现中国师生对其统治稍有不满意，或稍有爱国思想流露，就立即捕杀，实行血腥镇压。日本宪兵特务机关制造的奉天第三国民高等学校的镇压事件中，就捕杀我爱国师生35人。当时甚至因中国学生成绩好也是犯罪，如1936年，沈阳“共荣”中学，由于学生成绩优良的多，日伪特务机关就怀疑这个学校里有反满抗日思想，至使7名师生遭到杀害。

除了在学校推行奴化政策外，对新闻出版事业完全加以垄断控制。日本侵占沈阳14年期间，沈阳有4种报纸，即：《满洲日日新闻》、《奉天每日新闻》、《盛京时报》、《醒时报》。这些日伪报纸，均是宣扬日本侵略政策和日满亲善等内容的，有的社

长就是日本人。除报纸外，对于社会上出版的一般书刊杂志都要严格检查，仅据1940年的《满洲年鉴》记载，从1934年至1937年，禁止的杂志有2300多件，扣压4000部，普通书刊3500余件，扣压35000部。

日本统治者不但禁止扣压甚至还任意焚毁书籍，日伪文教部曾于1932年明令通告各地文化机关，凡涉及与日伪组织“国情”不合之书刊，一律急速焚毁。沈阳小北门里的学生书局，因藏有关内出版的书籍，即遭封闭，经理等人被捕入狱，2万余部书全部被焚毁。其后对沈阳各书局均严行检查，据日伪文教部的统计资料，只在1932年3月至7月间，就焚烧书籍达650万册。

在社会上设立了许多诸如所谓“民众教育馆”之类东西，还成立“道德会”、“协和会”等不少宣传奴化思想的机构，严厉控制和利用宗教团体以麻痹和奴役中国人民，修建了许多“神社”、“忠灵塔”，强迫沈阳人民祭祀。当时沈阳各影剧院上演的都是宣扬“日满亲善”以及淫秽、诱人醉生梦死、忘掉亡国之痛的影剧节目。日本帝国主义还用鼓励种植鸦片、允许开设烟馆的办法，诱使许多中国人吸食毒品，进行慢性自杀。据1943年伪《奉天要览》载，伪奉天市政府批准开设的鸦片专卖所全市就有八十多处。

有压迫就有反抗。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下，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

中，谱写出一曲“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以其巨大的辉煌胜利，揭示出一条真理：一切侵略者都没有好下场，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何等地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曾几何时，就被人民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伪满兴安东省的成立经过

巴达荣嘎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东北军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忍辱退出了沈阳。正当此时，以滕续文（哈丰阿）等人为首的东北蒙旗师范的蒙族学生聚议，要趁此混乱之际组织内蒙自治军，要武装摆脱国民党的统治争取内蒙自治，同时号召各地蒙族组织地方武装起义。当时布特哈达斡尔族出身的日本留学生绰罗巴图尔（郭兴元）、绰克巴图尔（德树元）、吉尔嘎朗（德古来），还有上海美术学校的学生耐勒图（鄂恭元）等人参与组织了内蒙自治军。他们当中的绰罗巴图尔回到布特哈（现在的莫力达瓦旗库如尔齐）一带，和东北蒙旗师范的一些达斡尔学生组织起武装队伍配合内蒙自治军活动，齐齐哈尔一带也有敖瑞平等组织了一些人。

内蒙自治军一度占领通辽以后，未守住，又被国民党军队夺回。正待组织再夺回时，却被日本军占领，并扬言要帮助蒙古自治。日本关东军方面与蒙古王公联系，叫他们出头拥护伪满皇帝，交换条件是：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并答应在蒙古地

区建立兴安4个省，在伪首都长春成立一个兴安局，管理4个省的事务。后又改为蒙政部。

蒙古王公和上层都表示拥护溥仪当皇帝，而且还都参加了溥仪的登基大典。这样一来，哈丰阿等人所组织的内蒙自治军也没有必要存在了。所谓的自治也由兴安四省所代替了。自治军的历史任务已经完结，也无人提倡什么自治了。内蒙自治闹了短暂的时间，却换来了兴安四省。后来兴安局改为蒙政部以及兴安四省的头头都任命了蒙古王公或者民族上层，对此蒙古王公表示欢迎。因为王公们的利益不但未被侵犯，反而受到保护，并且还当了官，于是哈丰阿等人的主张也就不了了之。

兴安南省的范围是现在的哲盟，兴安西省是现在的昭盟，兴安北省是呼伦贝尔盟。这三个省的土地原封不动，其中兴安东省却占了很大一块土地。原来东布特哈归洮河县，西布特哈归布西县以后，东西布特哈没有什么土地，只剩下历史的名称布特哈，但由于达斡尔族的青年们配合内蒙自治军活动的结果，分设兴安四个省的时候，也有他们的一份，这就在比原来的东西布特哈还要大得多的地方上建立了兴安东省，省会定在布特哈旗的扎兰屯。兴安东省下设五个旗，即布特哈旗、阿荣旗、莫力达瓦旗、巴彦旗，其中巴彦旗包括现在的鄂伦春旗。另外还有一个喜扎嘎尔旗，旗政府设在索伦。兴安四省刚开始成立时，叫兴安四个分省后来升为兴安省。伪满末年的时候，把兴安四省又合并为兴安总省，原来的省成为兴安总省的派出机构，设一个行政公署。这个时候，兴安局也名存实亡，蒙政部早已撤销，兴安总省直接归伪满国务院管辖。

兴安四个省的省长都是蒙古的王公或民族上层人物。兴安局长是扎嘎尔，原是兴安西省的省长。蒙政部大臣是齐默特色木丕勒，这两个人都是王爷。兴安南省省长开始是叶喜海顺，也

是王爷。兴安北省省长由达斡尔族凌升来担任。省长下面的厅长、秘书官、局长也都由当地的民族上层人物担任。以兴安东省为例，省长是原讷河县东布特哈八旗筹办处总办额勒春，总务厅长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还有点亲戚的关系的一个人担任，尽管已快入土也不能上班，但仍拿俸禄。这个人死后由巴金保来担任，巴金保原来是布特哈青年教育促进会的会长，对教育达斡尔、鄂温克族青年出过力，他曾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一半，让那些穷苦的从乡下来讷河县城上学的达斡尔族青年们居住，自己全家挤在一间大房子里。兴安东省的民政厅长是志达图，他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学习过。其他各旗的旗长、警察局长等都由那些中华民国时期的大小官吏、民族上层们担任。唯有一个特点是：省公署的各科长均由年青的达斡尔、鄂温克族青年们担任。如总务科长吉尔嘎朗（德古来）、会计科长阿恒泰（敖恒泰）、劝业科长绰克巴图尔（德树元）等人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九·一八”时组织武装配合内蒙自治军在莫力达瓦旗库如齐一带活动过的绰罗巴图尔（郭兴元）当上了兴安东省警备军司令官。其它参加过武装活动的一些同伙不少人都参加了伪军队，当上了大小不等的伪军官或伪官吏。

兴安东省刚成立的时候，除了有一名日本中村参事官以外，日本人没有几个。实权都掌握在达斡尔族青年知识分子手里，他们为了教育下一代在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在各旗所在地，努图克所在地都设立了小学校、卫生院、卫生所等。当时扎兰屯有一所师道学校（初级师范）和一所国民高等学校（等于中学），还有一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只收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族的学生，莫力达瓦旗还设立一所农业学校。从这些学校出去的学生中有不少升入国内各大学，如沈阳南满医科大学、建国大学、吉林师道大学、长春政法大学、哈尔滨医

科大学等，还有用蒙旗协助会的钱，去日本留学的。值得提出的是，达斡尔族的女学生也增加了不少。20年代初期，东布特哈八旗筹办处向南京保送几名达斡尔、鄂温克学生时，其中就有两名鄂温克族女学生，名叫涂景芳、涂景文，当时这种打破封建礼教的阻挠，挺身而出求学的勇敢行为在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族人中引起了轰动。在此以前，也有几名达斡尔族女生到苏联学习。

随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各地统治的深入，日本帝国主义对兴安东省的殖民统治也加强了。刚开始时，好象是你们的事，你们自己办。但不久就开始大量地派来日本人，从省到旗县的大小参事官都是日本人，而且说了算，一切大权都由日本人掌握，正职从省长、厅长、旗长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后来，连兴安东省的各科科长也都换成日本人。于是有些达斡尔青年对此不满，言论上如有外露，重则以思想不良，反满抗日来整，轻则把你调走，而且暗中盯住。到了日本垮台以前，日本人对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达斡尔族青年更加怀疑，特务们施展了用明暗两种手段对伪满的大小官吏进行监视。

（摘自《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辑）

我所知道的兴安西省

慕有山

日伪统治时期，我曾在兴安西分省、兴安西省当过职员。现将我所知道的兴安西省前后的一些情况，穿缀成篇，忆述如下。

一、兴安西省的前奏

日本侵略者在入侵南满之前，就曾派遣特工人员在内蒙古搜集情报，拉拢巴林右翼旗王爷扎噶尔和巴林左翼旗豪绅清卓理克图（汉名贺子章）。执行此项任务的是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郑家屯出張所所长菊竹和浅野良三，还有薄益三。他们在巴林右翼旗设立劝业公司（收购畜产品及牲畜），在林西县黑山头设立种畜场，借经商为名，将有军事价值的资料及蒙古族风俗习惯等拍摄成影片，交给日本特务机关，得到10万日元的报酬。

日军入侵南满后，又企图侵占整个内蒙古，还试图向外蒙扩张。为推行侵略政策，日军大搞民族分裂、挑拨蒙汉民族间的关系，满洲国国务院设立了兴安总署，下辖东、西、南、北四个分省，兴安西分省省会设在开鲁镇，所辖旗县为扎鲁特左旗、扎鲁特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翼旗、巴林右翼旗、克什克腾旗、奈曼旗，开鲁县、林西县、翁牛特旗（不久，两个扎鲁特旗合并为一个旗，并将翁牛特旗划出）。

兴安西分省，原隶属于兴安总署。当时，其机构设有总务科、地方科、文教科、劝业科、检查室，另外，还有一个警察大队。后来，这个警察大队改组为警察局，在省公署内只保留一个为数不多的卫队，并取消了检查室。总务科设有庶务股、文书股、人事股、会计股、需用股；地方科设有行政股、财会股、警务股；文教科设有教育股、宗教股；劝业科设有农矿股、畜产股、工商股。职员人数除卫队外，总计五六十名，多数为蒙古族，少数为汉族，还有三四名日本人。

二、兴安西省的建立及组织机构

1934年，日本按照其“南上”、“北下”的侵略部署，对蒙

古族实行了“怀柔”政策，竭力进行挑拨离间、破坏民族间的团结，撤销了原隶属伪国务院的兴安总署，改组为蒙政部，并取消了四个兴安分省的“分”字。兴安西分省改称为兴安西省，省公署所在地正式定在开鲁（省公署原定在巴林右翼旗王府所在地大板）。警察局改为警务科，取消原属于地方科的警务股，增设了会计科。其后，机构逐渐扩大，科、股名称亦多次变动，约略如下：

省长、次长（一度改称参与官，后又改名次长）。

总务厅：下设总务科、会计科（一度改称财务科、财政科）、经理科、人事科。总务厅最后改称为省长官房，设秘书室，安置了秘书官。

民政厅：下设行政科、文教科、劝业科（一度改称殖产科）、烟政科、建设科。

警务厅：下设警务科、特务科、保安科、指纹管理室及特务分室（特务分室虽属警务厅管辖，但实际上与日本特务机关有更多的联系）。

三、兴安西省的建制及人事变更

简任官：由“皇帝”任命，在“满洲国”兴安西省属最高官阶，省长、次长属此官阶。

荐任官：由“满洲国”国务院任命。厅长、科长、事务官、技佐均为荐任官。荐任官又分理事官及事务官，此则由其职位而定，在警察中科长为警正衔。

委任官：由“满洲国”国务院任命，亦称属官，委任官实行试补制，即经考试合格后成为正式委任官。股长、技士、科员均为委任官。在警察中，警佐、警尉（后又分为监督警尉及执行警尉）、警长多为委任官试补。一般技术员均为委任官试补。

雇员：一般为最低级的职员。非官吏者可由省公署人事科按各科需要雇用，但实际上均系长期雇用，无临时工。

兴安西省成立后，萨嘎拉扎布和哈丰阿二人在较长一段时间掌握实权。后来，日本人将哈丰阿一度调去“满洲国”驻日本使馆任参事官，萨嘎拉扎布调任巴林右翼旗旗长。名为升迁，实则削弱了此二人在蒙古族职员中的领导地位。至于各任省长及蒙古族各任厅长，皆属虚名，即无实权也无威望。

兴安西省首任省长为扎噶尔，此人系清朝亲王，在爵位上为最高的王位，他与日本人发生联系较早，故日本人委其为首任省长，并曾派其赴日本参观访问。

省次长一度曾改称参与官，均为日本人，职称虽为副职，但却实权在握。首任省次长名叫中村，其后有除野、海村等人。

各厅厅长均系蒙古族。警务厅第一任厅长为靳文泰，不久即更换为日本人当麻。首任民政厅厅长为诺拉嘎尔扎布，后由旺沁帕尔贵担任，首任总务厅厅长为靳文泰，继由萨嘎拉扎布改任。首任实业厅厅长为原文教科升任。总务科长为萨嘎拉扎布；地方科长哈丰阿；文教科长卜和克什克；劝业科长米济道尔吉。当时，日本人为数不多，均为副职或股长，蒙古族任科长者继后还有勒旺端鲁布、锡理德格都、郭漠北、那孙孟和等。

随着日本人职员逐渐增多，除警务科及特务科始终为日本人外，其他各科科长也多改为日本人，如浅野良三、绪方义道、上屋款次、佐佐木、寺田茂七等。股长级日本人则更多。后来，日本男女职员剧增，竟占省公署全部职员的半数左右。往来公文几乎全部为日文，汉文多属副件，蒙文则更寥寥无几。

四、兴安西省重要的施政及事件

1. 将两个扎鲁特旗合并为一个旗。

2. 在劝业科主管下，在开鲁县小街基一带及扎鲁特旗作过移民适地调查，计划先迁来少数朝鲜人，再迁来日本人，但实际上只迁来了少数朝鲜人。

3. 在警务厅主持下，协同日本军，“满洲国”蒙古军五团及警察剿灭奈曼旗“卜家皇帝”（“卜家皇帝”率众攻破奈曼旗公署所在地八仙筒，除一名日本人渡边外，其他日本人全部被杀）。

4. 在警务厅主管下，处理过“归还兵”事件（日本与苏联军队在诺门罕作战时，蒙古军逃回者多。当时，日本人未敢采取严惩态度，反而采取了安抚政策）。

5. 在文教科主管下，日本为了利用宗教达到侵略的目的，曾选派青年喇嘛赴日本留学。

6. 在兴安西省初期，成立了蒙文学会，不分蒙汉民族均可参加学习，为期不久即宣告解散，会址设在卜和克什克家西厢房。教师由阿木古郎、福龄阿等省公署职员义务担任，并无补贴。

7. 在劝业科主管下，各旗县建立了兴农合作社，强征农民粮食，名曰“出荷粮”。在用品方面，日本的供应机构采取消费组合，一般商店成立了“小卖联盟”。物价实行限制，规定商品必须贴上标签。标签分为“公”，即公定价格；“停”，即由发布布告后，不得再行提价了；“自”，可自行定价。

8. 在文化教育方面，建立了两所国民高等学校，一高专收蒙古族学生，二高专收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在总务科主管下，设置了弘报股，从事宣扬王道乐土及大东亚共荣圈。同

时，收集民间思想情报，将日本国从前所称的“友邦”（即朋友关系），改称“亲邦”（即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9. 在开鲁县设立了兴安西省地方职员训练所，对各旗县的低级职员施以亲日思想及施政、业务诸方面的教育，以加强其统治。

10. 强征不合格的国兵（即所谓的“国兵漏子”）服劳役，主要是从事军事设施方面的劳动。

11. 强迫贫困农民赴黑龙江省垦荒（即所谓迁民）。

五、兴安西省的撤销

1943年10月，四个兴安省取消，改组为兴安总省，省公署设在王爷庙（乌兰浩特）。在原兴安西省辖境设两个行署，一个在林西县，一个在通辽县。

（摘自《哲里木盟文史资料》第一辑）

日伪对辽中人民的政治统治

编委

日本侵略者随其侵略势力的伸张和伪满洲国政府的建立，迅速地推行了殖民地的奴役政策，先后制定了“劳工法”、“国兵法”、“勤劳奉公制度”、“粮谷出荷政策”（强制征收粮谷棉麻的反动措施）等等。为配合奴役政策的执行，又开动了所有宣传工具，到处宣扬所谓“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用以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同时极力强化军、政、警、宪等反动机器，从多方面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1932年初，日本侵略者的反动统治势力，开始由城市蔓延

到集镇、农村，并建立了严密的统治机构。辽中县也不例外。

县公署是日伪时期县一级的政权组织，是县里最高统治机器。伪满前期辽中县公署建立之后，署内设县长1人，日本参事官1人，下分总务科和内务、警务、财务、教育四局，至伪满中、后期，日本侵略者为便于对伪政权的直接控制，而将日人参事官正式改称为副县长，同时为适应统治人民的实际需要，对县公署内的原有科局，也进行了全面调整。调整后的伪辽中县公署行政组织如下表：

县长 副县长 (日本人)	1 庶务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经理股 文书股 庶务股
	2 行政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街村股——街村共三十三股 教育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民众教育馆 在满日本小学一座 国民优级学校三十三座 国民学校一百六十三座
	3 财务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烟政股 国兵民籍股 土木股 劳务股 理财股 征收股
	4 实业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经济股 植产股——屠宰场一所 农林股——采种园一座、苗圃一座
	5 地政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地政股 登录股
	6 警务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特务股——特务系、特高系 保安股——保安系、经济系 司法股——司法系、搜查系 警务股——警务系、庶务系 警备队 警察电话局 警察官教习所 警察署五处

县公署里的一些重要职位，均由日本人充任。日本人虽然

担当副县长、副科长等副职，但是他们确是全县的主宰。所谓“满系”（中国人）县长、科长与伪皇帝溥仪一样，都不过是傀儡而已。

警察是日伪政权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日伪极力强化警务系统。县警务科内共分4股、8系。其中特务股（两个系）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当地人民和伪官吏、公职人员的思想动向；侦缉中国地下工作人员；监察“特别要注意人”。监察宗教团体、集会结社；检查信件、出版物等等；至于劳工逃跑公报，流言通报，也统归特务股管理。保安股（两个系）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营业许可；管理鸦片麻药；统制粮谷；统制专卖品和商品；检举经济犯罪等。司法股（两个系）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刑事犯罪；审讯刑事案件；监察“刑事要视察人”等。警务股（两个系）的主要任务是：编制调动各警察署、警察所的人员；管理、发放枪支、弹药等。另外警务科还在县城建立了一些附属机构。

伪满初期，日伪为加强警察统治，曾把全县农村划分为10个警区，每个警区内，除设有1个警察署外，还设有若干个警察分驻所。1937年（伪康德4年）警区废除，警察署由17个减为7个，警察分驻所则由38个增加到44个。到了伪满后期，全县分别在辽中街、满都户、小北河、朱家房、小新民屯等大集镇地区设立了5个警察署；在街、村所在地设立了33个警察分驻所（每街村1个）和4个警察派出所。警察署内设有警务、司法、保安、特务、经济五系；警察所内则设有经济、特务、保安三类警察。

日伪时期的警察队伍极其庞大，全县从警士、警长、警尉补、警尉、警佐到警正，共有300余人。单是县警务科就配备三十多人。其中除警务科长1人（警正）外，每股有股长1人（警佐），股副1人（警尉），每系有系主任1人（警尉），系员二三

人(警尉补或警长)。警察署的人员配置,除署长1人(警佐)外,每系有系主任1人(警尉),系员2人(警尉补或警长)。警察分驻所、派出所置有所长1人(警尉补或警长),内、外勤警士若干人。

在县警务科内集结着精干的日本特务,铃木、龙波、林武雄等日本侵略分子,长期担任着警务股副和特务股长等要职,直接操持警政大权。而大部分“满系”警察官员,则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依附在日本侵略者的脚下,残害中国人民。如满都户地主,辽中县内的头号汉奸刘海澄(外号刘大痨子),由于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积极率领县公安队镇压县南一带的抗日义勇军,而深受日本侵略者的赏识,被任命为县警察大队长。从此,他更加效忠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屠杀爱国志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23名靖安队青年战士(又称红袖头子队)哗变,携械出来寻找抗日队伍,参加抗日。当他们行至我县境内的辽河西岸(五里槽子村)时,刘海澄这个汉奸,用花言巧语骗取了他们的信任,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又骗到辽中县城向日本人请功,被日军用轻机枪扫射枪杀了,刘海澄唯恐不死,亲自挨个补枪。23名爱国者牺牲了,刘海澄却因此得到了日本侵略者奖赏,当上了警察局长。

日伪警察机构的性质和任务,虽然名义上是维护地方治安,实则是保障推行“日伪国策”,镇压人民反抗,维护日本侵略者残暴统治的机器。

日伪警察对人民群众的政治迫害是骇人听闻的,迫害的方式方法也是极其残暴的,如对“特别要注意人”,凡日本侵略者认为不够驯顺的而免职的伪官吏,或有一定学问、在地方上负有声望的人,以及所谓“思想不纯正”的人,均被列为“特别要注意人”的名单进行严密的监视,防其反满抗日。每个“特

别要注意人”要缴2寸免冠照片3张，填写“特别要注意人”登记表3份，由县警务科特务股掌握，报省警务厅备案，以便在外逃时，进行通缉。县特务股特高系外勤警察具体执行监视“特别要注意人”的任务。每月特高系外勤人员会同警察署特务系外勤人员到“特别要注意人”家里，视察两次。通过与“特别要注意人”直接谈话或其他方法了解“特别要注意人”的思想、行动。每次视察后，都要用口头或书面材料向特务股长（日本人）做直接报告。有时也给“特别要注意人”加上“尾刑”，即雇用地方上的流氓、烟鬼，对“特别要注意人”进行盯梢。“特别要注意人”如果外出时，必须向警察署报告，以防“不轨”。如果发生政治案件，当地的“特别要注意人”则首先要按“嫌疑犯”的罪名而被拘押、审讯。当时我县县城的张某、洪某，满都户的刘某，冷子堡的张某，卡力马的马某和朱家房的李某等人，都先后被列入所谓“特别要注意人”名单，长期遭受精神上的迫害。

“刑事要视察人”，凡因“刑事犯罪”刑满出狱的人，或被认为有刑事犯罪可能的人，均被列为“刑事要视察人”进行长期监视，以防危害所谓地方治安。每个“刑事要视察人”要缴2寸免冠照片3张，填“刑事要视察人”登记表3份，由警察署司法系和警察派出所掌握，报县警务科司法股备案。警察署司法系外勤人员具体负责监视“刑事要视察人”的任务，监视的方法与特高系外勤人员监视“特务要注意人”的方法相同。当时全县的“刑事要视察人”很多，每个警察署管内都不下七八名。

政治犯、思想犯和嫌疑犯。凡是进行反满抗日活动的人，或触犯伪政法令的人，一律加以政治犯的罪名而判刑或处死。对于虽未在行动上反满抗日或触犯伪政法令，但如果口头上流

露出对日伪及其政策不满，也要加上思想犯的罪名，轻者受刑，重者被送进思想矫正院进行“思想矫正”。其实思想矫正院就是变了名的监狱。入院的要想出院是极不容易的。即或侥幸出院也因为遭受各种刑法，特别是电刑的矫正，变成了失去理智的废人。

嫌疑犯分成政治嫌疑犯和刑事嫌疑犯两类，又包罗多种多样的人，如刑事嫌疑犯中就有纵火嫌疑犯、盗窃嫌疑犯、抢劫嫌疑犯等。在一个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发生后，凡被认为与案情有关或有嫌疑的人，都要以嫌疑犯的罪名被逮捕刑讯。

日伪警察对所谓罪犯动用的刑法是极其狠毒残忍的。除用板子、竹剑毒打外，还有从口腔或鼻孔灌凉水、灌煤油、灌辣椒水，用子弹头挖肋条，用笔杆夹指头以及“拷篋”（详见后述）等等。

我县有许多无事群众，甚至未成年的小学生，因为所谓嫌疑犯罪而遭到上述各种刑罚。其中有的成了残废，有的含冤自尽，也有的死于非刑。

1941年（伪康德8年）旧历八月上旬，伪辽中县协和会本部被烧，纵火者在房墙上贴了反满抗日标语，内容是：“焚禽兽之巢穴，勿忘祖国”，“打倒小日本”。这一政治案件发生后，县警务科特务股和辽中街警察署特务系的所有特务、警察，由特务股长（日本人）龙波亲自率领全员出动进行侦察。奉天宪兵队也派人前来协助破案，协和会失火当晚在会内值宿的职员柳春阁知道自己脱离不了关系而畏罪逃跑。于是县警务科特务股一面派人缉拿失踪者，一面将县城的“特别要注意人”张某和协和会会计宋某一起以嫌疑犯的罪名逮捕刑讯。在刑讯过程中，虽然使用了灌凉水、灌煤油、灌辣椒水等所有刑罚，也未得出口供。然而，一案未破，一案又起，事隔数日，在卡力马小学

附近黄姓的大门墙上，出现了同样内容的反满抗日标语：“闹便协和会，飞人走来”、“打倒小日本、勿忘祖国”。县警务科特务股和辽中街警察署以及卡力马警察所的所有警察又全员出动，到卡力马小学侦察。首先将卡力马全体学生都按倒在地，每人打了几屁股板子，企图让学生说出犯罪者，但打了一气毫无效果，就又对全体教师和较大的学生进行逐个审查，并把校长马龙媒和学生满庆龙等四五人带到县警务科特务股刑讯。几个十几岁的小学生被凉水、辣椒水灌得昏头胀脑，嚎啕大哭。他们自己的确没写反满抗日标语，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日伪警察看到无法从他们嘴里获得罪犯的姓名，只好把他们释放回家。校长马龙媒虽未受刑，但是，他却是主要的嫌疑罪犯。因此，日伪警察在把他放出后，立即给他加了一个“尾刑”。

1942年（伪康德9年）春，蒲河解冰以后，一具死尸浮了上来，经检查正是“协和会”成员柳春阁的尸体。于是柳被认定为纵火和写反满抗日标语的政治犯，由于“畏罪”，投河自杀。案件已破，留置场（监狱）里关押的嫌疑犯宋某才被无罪释放。卡力马小学校长马龙媒这时已因“教学失职”被降职为教员。虽然这样，日伪警察特务仍不放过对他的监视。后来，马龙媒借特高系主任乔长有娶弟妇的机会，卖掉三垧三亩地，以伪币600元的全部地价，到乔长有家上了礼，才算甩掉“尾刑”。

1939年6月，朱家房子警察署管内戴家房子地主陈荫董家被抢。朱家房警察署得讯后，出动了大批警察，对戴家房子村民进行了野蛮的搜查。结果毫无所得。嗣后，于家房警察分所把一个在集市上卖饭勺的小商贩郝某，当做嫌疑犯送到朱家房警察署。于是朱家房警察署长王莫恩亲自指挥司法系警尉补李成仁等进行严刑拷问，除用竹剑、木板毒打外，还施以灌煤油、灌辣椒水，用钢笔杆夹手指，用子弹头挖肋条等种种酷刑，致

使郝某多次死去活来，头发根渗血。特别是在最后一次审讯中，警察竟惨无人道地使用了所谓“拷筐”刑，将郝的手脚象绑猪一样绑到一起，用木棒穿过郝的胳肢窝，再将木棒两头担在办公桌上，然后李成仁等3人从早晨8点钟开始轮番悠郝达4个小时之久。结果郝被悠得胳肢窝皮破肉飞，骨头都露出来。待李等罢手不悠的时候，他已是牙关紧闭，双眼不睁，奄奄一息了，入夜就被埋进了乱坟岗子。当他咽气前的一刹那，他的右食指被牢牢地按在一张早已写好的假供词上。次日这张假供词连同医生的一张“患脑脊髓膜炎而死”的假验尸证明，一起被报到县警务科司法股，完结了陈荫萱被抢一案。郝某含冤死去了，他远在沈阳家里的父母、妻子却不知道他的下落。

日伪警察特务除对我无辜群众多方迫害外，还积极为日寇抓劳工、抓国兵，搜捕我地工人员。汉奸分子李成仁在县警务科警务股任职期间，曾多次押送劳工到指定地点，其中在1941年6月间，往黑河押送劳工途中，与日本鬼子一起开枪打死了跳火车逃跑的青年劳工谢玉福（茨榆坨人）。李在特务股特高系任职期间，曾在县城东门外抓捕了4名从本溪煤矿逃出的所谓“特殊矿工”，经李亲自审讯后，又送回本溪煤矿。实际这4名“特殊矿工”本是我关内的抗日游击队员，在战斗中被日寇俘虏后，编为“特殊矿工”强迫在本溪煤矿从事非人劳动的。

这个丧心病狂的汉奸分子李成仁，由于积极地效忠日本侵略者，所以在一年之中就受到三枚“精勤章”的奖赏。

日寇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除通过警察特务、汉奸走狗对我县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外，还于1935年（伪康德2年）下令开展了一个“统器回收运动”（即收缴民间武器）。目的在收缴民间武器，解除反抗之患。当年秋，辽中县警务科奉令后，立即组织一个20余人的刑事搜查队，到朱家房、老达房、满都户

等重点地区，大搞“銃器回收”。枪支弹药无不收尽，甚至连一些铁筒、铁管也在收缴之列。在“銃器回收”中，警察特务借机敲诈勒索，翻箱倒柜，大发横财，使许多群众遭受一场空前的灾难，有的被打，有的被罚，有的甚至由于被认为私藏军火而不得不破产行贿，求情保命。

农村的街村公所是日伪时期的基层行政单位。日伪政权在辽中建立之初，基层政权仍沿用旧的区村制度。1936年（伪康德3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为加紧对农村的统治，而制定了“街村制”。经调整以后，全县共划定一街32村。街、村公所内各设街、村长1人，主管村政，又各设副街长、村助理1人，辅佐街、村长掌管村政。下分庶务股置股长1人，吏员1人，掌握文书、备品、会议等事务。财会股置股长1人，司计1人，掌管全村预、决算及国、县、村税的征收事务。动员股置股长1人，吏员1人，负责国兵征募、劳工调派及督催粮谷出荷和物资献纳（强行征集物资）等事务。实业股置股长1人，技术员1人，专管棉麻栽种及督催棉、麻缴送事宜。

街村以下分屯，设屯长1人，屯下分牌，每牌十家，“一家犯法，十家连坐。”这就是日寇精心策划的严密的农村统治网。

街村公所的任务主要是要钱、要粮、要人（国兵、劳工）和推行经济物资统制政策。在各个街村中，还有一个与街村公所平行的组织，“物资配给委员会”负责掌握专卖品、商品的配给事宜（商品的限量供给）。

关于街、村长的人选，首先由各地的警察署长物色。被物色的人物多系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铁杆汉奸。如腰屯村长赵经武即系此流。赵出身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善于逢迎交际。他当上村长以后，立即翻修房舍，装饰门面，勒令村民修路，植树于路旁，以壮观瞻。开始就给日伪官员一个

“能干”的印象。他在招待日伪官员上，做的更为出色。备有整洁的房舍、专用的行李，还选用上好厨师，做出丰盛的饮食，以供俸其主子。赵又经常到县长、科长家里送礼，大米、白面、鱼、肉、蛋、瓜、菜等无不送到。他对日伪翻译和靠近日本人的有些人也竭力奉承，拉拢关系。不仅如此，他还破例地请了一个日本人“村政指导官”，常驻腰屯村（其他村都没有日本人“村政指导官”），以表示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忠诚和有利于对人民的统治。由于赵甘心认贼作父，很快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有力爪牙。并由于他能够完全听命日本侵略者的旨意，积极进行抓丁拉夫，强迫群众出粮等罪恶活动，因而第一个被命名为“模范村长”，腰屯村也成了所谓“自兴村”（即模范村）。

日本侵略者为加紧对东北地区的掠夺，根据所谓“国家总动员法”不断地强征劳工，把大批青壮年劳动力送往矿山，为其开采煤铁等各种矿藏，从事非人的劳动。在日本侵略者统治的14年里，从我县要去的劳工，已无从计算。但据伪《奉天省政史》所载，仅1940年（伪康德7年）和1942年（伪康德9年）两年三次，就要去3629名。其中单是1942年一次就达2545名。其实每年并不止要一两次。

当时“模范村长”赵经武所管辖的腰屯“自兴村”，是全县出劳工较多的村子。仅在1941年（伪康德8年）至1945年（伪康德12年）的5年间，就出劳工八百三十多人次，占青壮年总数的60%以上。

赵经武这个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卒，不仅遵照主子的旨意，按时如数的完成劳工“割当量”（日语，即担当数），还于1945年在“割当量”之外奉送了200名，并亲自押解到本溪煤铁公司。赵在要劳工方面所表现的“卓越”才能，深受日本侵略者的赏识。日本侵略者为表彰他的“特殊贡献”，一次就奖给他伪币二

百多元，还有大米、白面、奖状等。然而被赵送去当劳工的苦难同胞，却日以继夜地做苦役，干重活、吃糠子面，终日不得温饱。前后因饥饿劳累和得传染病而死亡，有据可查的就有15名之多。其中在最后奉送的200人中就死了7名。腰屯村如此，其他32街村也不例外。

伪满末期，大帮牛村的刘凤柱，曾一连出了四次劳工。1944年（伪康德11年）夏季某夜，刘凤柱刚躺在炕上，就被伪保长王锡山等日伪爪牙五花大绑地拖出了家门，用大车拉到腰屯，推入“防空洞”里，里边是腰屯村等12个村屯抓来的劳工。在“防空洞”黑暗的一角，几个狗腿子正在拷打审问一群妇女。因为她们放走了自己的亲人，有碍赵经武的“劳工完遂”（完成抓劳工任务）。

第二天用卡车一直把他们送到桦子煤矿。在桦子煤矿的劳工们，住在黑暗的工棚里，吃的是苦涩的糠子面。山上山下总是不断地往外抬死人。其中有许多还没咽气的劳工也被扔入山沟或扔到狼狗圈里。

刘凤柱心想再不能呆下去了，死亡的命运不定哪天会临到自己的头上，于是他决定逃跑。一天夜里他乘岗哨打盹的机会，逃出了矿山，不分昼夜直奔家乡，饿了就在大地里采些野菜充饥，走了两天两夜，跑回了自己的家。

过了几天，这件事被地主金德才知道了，于是金德才就和伪村公所串通，花了几个钱，把自己摊上的劳工又给刘凤柱安上了。在那不分曲直的社会，他只好又去南芬铁矿当劳工。就这样他一共当了四次劳工。由于过分劳累，他骨瘦如柴，老婆孩子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腰荒地的武春付（贫农）哥三个，一起被抓到铁山当劳工，而回来时只有他自己，两个哥哥则装成两箱骨灰运回家中。

大帮牛村的赵维才（贫农），在伪满末期当劳工中，因不堪日伪的折磨逃跑了。然而他的父亲却因此被活活折磨死了，妻子被日伪狗腿子强奸后，也得病而死，他的孩子，因没人照料，也没有剩下。

二道岗子王凤阁在本溪当劳工时，一时不慎，身子被绞进机器之中，当即首身异处，家里闻讯后，母亲、儿子因过分忧伤病死，妻子成了疯癫的废人。

伪满时期有很多无辜百姓、大批农民，由于残酷的劳工法压在他们的头上，造成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家败人亡。这种悲惨遭遇是一言难尽，不胜枚举的。

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向中国南方进军和扩大太平洋战争，而在东北地区无止境地抓兵拉夫，充当炮灰。1940年4月1日又颁布了所谓“国兵法”，规定年满18周岁到23周岁的青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这是伪满头等重要的国策。因为它是完遂大东亚圣战（完成东南亚侵略计划）的物资基础，没有炮灰就没法占领殖民地。因此所有的日伪官吏、警察，个个都必须忠实执行抓兵这一政策。

1942年3月开始从我县征集第一期“国兵”，以后的4年里从我县征去的“国兵”数，已无法考察，其实凡在国兵年龄的青年男子，除少数官僚地富子弟外，很少能够逃脱。

在那黑暗的年月里，母亲担心儿子，妻子担心丈夫，不知什么时候被抓走。为躲避国兵，许多青年不能和家人团聚，根本谈不到和乐的家庭生活。

日伪大量抓兵拉夫和无止境的掠夺和搜刮，使广大贫苦农民家破人亡，饥寒交迫，有的逃荒外地，远离家乡。如当时仅五十几户的郑家屯就有6户逃荒到江北，有的被迫自缢或被关在监狱。所以当时流传一句歌谣：“穷人面前三条路，逃荒、上

吊、坐监牢”。逼人走上这几条道路的凶犯，就是遍布全县各地的街村公所伪官吏和警察特务，他们常年压在人民头上，除了征兵要粮就是抓劳工，敲诈勒索，无恶不作。百姓对他们深恶痛绝，但迫于敌伪势力，敢怒不敢言。1945年东北光复后第一个春节，在一家普通农民的大门上贴了一幅对联：“村分所协日殃民十家九害莫此为甚，特务警裁赃敲诈一案百冤谁敢奈何”。彻底揭露了日伪村政官吏、警察特务的滔天罪行，抒发了全县人民反满抗日的愤怒情绪。

随着“七·七”抗战的爆发，日本侵略者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尤其感到劳动力不足，如国防建设、农业生产、重工业建设、资源开发等都缺少劳动力。所以日伪又于1942年11月18日颁布了所谓“国民勤劳奉公法”，规定年满22岁的青年有“国民勤劳奉公义务”。其实凡是未检查上“国兵”的人，不管多大年龄都要被编为“勤劳奉仕队”（群众称之为“国兵漏”）到工厂、矿山尽义务劳动。人们一到勤劳奉仕队除练习下操打仗外，主要是从事修筑工程、开采矿山、修哈大道，实质上他们就是服劳役的劳工。

日伪时期设有“日满协和会”，这个组织是日本侵略者的反动宣传机构，直接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领导。它是鉴于日本侵略者力图“长治久安”，除军事屠杀、警宪镇压、政治胁迫之外，以思想麻痹手段缓和民族矛盾而建立的。因此，它是日伪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说客”。当时我县也有这一组织，县一级叫日满协和会辽中县本部，直接受省协和会领导。正副县长兼本部长。事务长一人，由日本人专任。初期只有本部员一两人，嘱托一两人，雇员若干人，后来增设了指导、庶务、青少年等科。

在33个街村中均设有日满协和会街村分会。由街村长任会

长，置雇员若干人。

协和会会员资格。凡年满20岁以上的男子均可加入，但必须是“思想纯正”者。所谓“思想纯正”就是没有反满抗日思想。

按照协和会组织纲要的说法，“协和会是唯一永久、举国一致的实践组织，和政府（伪政权）是表里一体的”。其任务有五，即：“宣扬建国精神；实现民族协和；向上反映国民生活；彻底宣德达情；完成国民动员”。究其实质，就是日伪政府的传声筒。所以当时就有民谣说：“政府放个屁，协和会唱台戏”；“前边走着讨伐队，后边跟着协和会”。然而日伪当局对它却赞扬备至，说它是“宣德达情”的好机构。所说的宣德是什么呢？无非是日本侵略者所谓的“国策”、“圣战”（日本侵略者把野心吞并亚洲而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叫“圣战”）、“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亲邻友好”等一些谎言谬论，用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消磨人民的抗战意志。在日伪政府要劳工时，它就宣传当劳工如何好，说什么有“劳工改善提案”，又挣钱，生活又高。腰屯村协和会分会向群众宣传这一套的时候，一个当过劳工的老农说：“改善，改善，都是欺骗，谁若相信，谁是混蛋”，可见人民群众已看透敌人的阴谋了。在要国兵时，它又宣传当国兵是每个国民的“义务”，是“完遂圣战”（完成侵略战争）应尽的责任。在征收出荷粮（强制征集粮谷、棉麻等）时，则宣传为保证“完遂大东亚圣战”，百姓尽量多缴纳粮食，为国尽责。这就是协和会自命的“宣德”。所以总起来说，日本侵略者是利用这个所谓表里一体的协和制度内外夹攻，推行“国策”，使人民在他们所提倡的“一德一心”等口号下，无条件的顺应着“国策”而已。“国策”者何？简言之就是要人、要粮、要税，要东北人民服服贴贴地当亡国奴。因此当时人民群众一

致称“协和会”为“协和坏”。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我县的14年中，就是通过上述一系列反动组织和途径，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进行政治上的统治和镇压。

（摘自《辽中县文史资料》）

伪满郭尔罗斯后旗公署 的组织机构及行政管理

赵 袁

1941年春，我被伪郭尔罗斯后旗（今黑龙江省肇源县）公署录用为职员（我是从农民训练所毕业），分配到内务科征收股当雇员的。

当时，伪旗公署内设有3个科，即是总务科、内务科和警务科。因为原来的办公大楼，在东北抗日联军攻克肇源城时上层被焚毁，底层经维修便成3个科的办公室。

总务科：内设3个股。庶务股主管人事、宣传、机关工作等；文书股主管文件收发、打印，档案保管及印鉴等；经理股主管全旗预决算、备品购置、发放，工资、奖金等业务。科长秦春因涉嫌于抗联，当年被调往热河省青龙县。

内务科：内设实业、教育、行政、土木、地政、征收6个股。科长格增久是超等村的蒙古地主，年过半百，高身材，为人和善、没脾气，是个“牌位”，实权都在各股长手中。

警务科：内设警务、保安、特务3个股。科长张鹏第无论从白胖的高身材或气质上看，都是个典型的旧官僚形象。

各科在当时只有1名科长，尚未安插日本科附。

从1943年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侵略者为适应“非常时期”需要，将伪旗公署的机构进行了充实和改组，把原来的3个科改组为1室7科，根据个人记忆，分述如下：

一、改组后的机构设置及主要人员

伪旗长达瓦年近花甲，傻大黑粗，不识汉字，说汉语困难，鸦片烟瘾很大，在日本人面前纯系傀儡，对蒙汉同胞却十分蛮横。日本参事官儿西崇，是个面色青白、从无笑容的高身材中年男子。在伪旗长和参事官为首的旗公署内下设机构为：

(一) 审议室：是全旗行政的决策机关，乃日本人进行统治的核心。各种上报下达文件只要有审议室主查盖章，参事官即可放心盖章批准，旗长自然不在话下。审议室主查是日本人，名森乡里，也是个“万年不乐”脸孔，为人阴险、狠毒，很难办事，室内还有两三名蒙汉族职员。审议室附设一个无线电室，专供日本人收听情报用，中国人不许沾边。

(二) 总务科：属各科之首，下设庶务、文书、经理3股，全科共二十五六人。科长纳木克琪（包浚明）蒙古人，曾留学于日本，是个近视眼，经常戴眼镜，在日本人面前常为蒙汉族受凌辱职员解围。科附佐藤是日本人，因身材高被称为“大佐藤”，性格粗野暴躁，外号“傻柱子”。兼职科附渡边，日本人，身材黑壮，少言寡语。

(三) 行政科：下设5个股。即街村股、动员股（曾名劳工役股）、土木股、国兵民籍股、烟务股（曾名保健股），全科约20余人。科长杨维新，铁青脸中等身材，是日本人忠实走狗，因他为人吝啬、语言刻薄又甚狡猾，群众送号“损贼司令”，曾为虎作伥、打骂科内职员。科附佐藤（为区别于大佐藤，都叫他

“小佐藤”)，性格阴险凶残，对职员苛刻。

(四) 开拓科：下设6个股，有开拓股、农业股、林业股、水产股、畜产股、工商股，全科约40余人，为推行日本人的殖民政策，在西部各村大力掠夺民田，建设所谓，“农造地”，因此，开拓股的编制为最大，人员多达十几名。科长前任是渡岛喜佐时为日本人，长条个儿、性格内向。后任为孟和巴雅尔（韩维民）蒙古族，伪大学毕业，通晓日语，不苟言笑。科附由开拓股长白尾兼任，这个状似黑熊的中年日本人，性格十分暴戾，经常打骂蒙汉职员，一次酒醉后，曾要全科职员在室内排成一行，从头至尾挨个儿打耳光子，称为“配给嘴巴”。

(五) 地政科：内设地政股和登录股。全科共有职员十五六人，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呼兰、巴彦、双城、宾县等地。科长鬼仓泽彦，黑瘦大胡茬戴眼镜，他与其他科很少接触。

(六) 财务科：内设征收、理财两个股。征收股内包括全旗16个街村的一二名财务驻在员，共有职员30名。但在春秋两季收渔税和整理土地台帐时，还要招考临时雇员十几名。科长刘鹏举是四方山下大地主刘子阳的侄子，曾任肇源街长，是个有名的“老太太官”。科附渡边兼任总务科附。

(七) 文教科：科内两个股，即学务股、礼教股，全科10人左右。另有蒙民厚生会蒙古职员2名，在科内与礼教股合属办公。前任科长为孟和巴雅尔（后任开拓科长），后任科长博彦朝克（何辑五）为人宽厚，不多言语，任职期间很短。科附由实验校主事吉田麻治（日本人）兼任。

(八) 警务科：设股仍与1943年前相同，只是人员编制较前大为增多，由原来十几人，增至20余人。警务科长为警正，各股长为警佐，其他成员均为警长以上的警尉补和警尉。1943年前的前任警务科长陈鼎彝只有三十来岁，是个白面书生形象，日

语水平很高，他的姐姐是财务科长刘鹏举续弦妻子。后任警务科长关奇绶，形若胖猪，凌辱群众为其能事，在催缴“出荷粮”时，他对贫苦农民随意打骂。1943年因应征国兵与修堤民工去东门外天亨久烧锅抢购白酒，他亲自制造了一场冤案，上报谎称知识分子乘新兵入伍之机发起了反满抗日暴动，并将即要入伍的两名小学教师杨崇秀（头台人）、高鸣楼（茂兴人）做为罪魁祸首逮捕入狱，判刑后，高死于狱中，杨坐牢至光复。1944年肇源发生全城大火以后，关对受灾居民大讲因果报应，引起灾户公愤。

二、伪旗公署的官吏等级及其职称

伪旗公署的旗长、总务科长、警务科长、开拓科长为荐任三等官，参事官为事务官，其他科长均为委任官（属官），股长有属官也有委任官试补。没有任官的职员1943年前有吏员、雇员之分，后则改称：事务员（吏员）、事务员补、雇员、临时雇员四等。事务员除极优秀者外，不能任股长，全旗公署事务员任股长的只有国兵民籍股的王松林和理财股的李树藩2人。此外，开拓科各股有技术职称，即技士、技术员（相当于事务员）、技术员补（相当于事务员补）。文教科学务股有教育职称，即甲种教谕（相当于委任官）、乙种教谕（相当于委任官试补）、教导（相当于事务员），科内也有事务员、事务员补，但没教辅（一般小学教师）。

伪旗公署除职员外，还有一名博役（勤杂工）各种待遇与职员相同。

三、伪旗公署职员的录用与薪俸（工资）制度

日伪录用职员有三种渠道：一是职业学校毕业分配，如农

民训练所的学生自1937年至1940年的四期毕业生共120余人，大都分配到旗公署各科、兴农合作社和各村公所去当职员；二是考试，择优录用（多为录做临时雇员，工作称职再转正），条件注重文化水平、健康状况两项。1938年招考职员竟采取要考生从旗公署门前同时跑向码头，在码头设专人发准考证，领证后再跑回来，超出规定时间的不准入考场。三是学校（如国民高等毕业的）或个人推荐。录为财会人员的，要有一家商号出具保条，以防携款潜逃。新录用的职员起薪最初是20元，1943年后增到34元。正常提薪是每一季度增加2元，但病事假或迟到超过三次的，或工作上有明显误差、漏洞或有贪占被查出者不予增薪。在每月的基本工资以外，另有家属津贴，按义务抚养的人数，每口人每月在薪俸内多加1元。出生、娶入的当月就加发，死亡嫁出的当月就扣出。此外，还有“语学津贴”，凡是在职考上一、二、三等日语翻译的，按等所规定标准，纳入工资，逐月发给。一般雇员、事务员补、事务员参加任官考试。考上“属官”或“试补”的，将原工资改按任官待遇标准发给。薪俸领取除警务科有人专管自发外，其他各科一律于每月8日到总务科经理股领取当月的“俸给”。年末奖金是固定额，人人有份。

四、对伪职员的考勤

总务科庶务股专设一人负责考勤，每天上班前摆出签到簿，以加盖本人名章为有效。上班铃响便锁起来，然后由主管人查明未签到的原因，在签到簿的当日格内加盖“迟到”、“事假”、“病假”、“缺席”的蓝色长方印章。对公出人员要由本科股长事先报给庶务股主管考勤者，按日盖上“公出”红色印章。除签到簿外，庶务股还挂着一块钉有各科职员名牌的大黑板，每天

午后下班前，主管考勤的把名牌全翻过背面，早上签完到的人，要把自己的名牌翻过来。为了查勤方便，每个职员办公桌抽屉旁也钉着一个名牌，日本人在抽查时，随时按名牌打听此人下落。凡全年签到簿上满堂红，没有一个蓝色印章的，年末发给薪俸5%的“精勤奖”金。

五、伪旗职员的工作制度

每日早8点上班铃响以后，各科职员立即到正厅前装有伪满皇帝“御影”诏书的水泥建筑物前列队（每科一行），升伪国旗，唱伪国歌，向阵亡的侵略者默祷，然后作早操。操后，参事官、审议室主查或总务科长、科附有要讲的话或通知、要求等就在队前讲出，没有讲的就解散。回到各科以后，职员轮流用日语领读一遍《国民训》，读后，坐下来接统一发下的64开小黄本《日用日语官署会话》默读一小时，才开始处理业务。

伪旗公署值宿每夜3个人，1名代班股长、1名职员、1名夫役，住在电话室的小炕上，有值宿记事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规定职员有“非常召集”制度。即是夜间听到警报机一响，立即打上腿绷，戴上脑后钉有3片宽布条的战斗帽，跑步到总务科集合。其实，多是训练演习，只有一次因康生院囚禁的上百名鸦片瘾者逃跑，召集职员分头在城内搜查到过半夜，一个也没抓到。

伪旗公署各科职员分工明确，各负专责。一般是按上级指示办事，旗内不独立制订规章制度或开创什么事业，也没有会议。要办事形成文件，格式千篇一律，即“首提之件关于……等因奉此”，拟稿后，用写有“仰裁决”三字的厚纸夹逐级送阅，加盖名章。即：经手人、系主任、股长、科附、科长、总务科附、科长、审议室主查、参事官、旗长，这些格内名章盖齐了

才能办理。所以当时有个老职员春节写副对联是：“首提之件辞旧岁，等因奉此过新年”。

对伪职员要求最严的是对日本语的学习。自1943年开始，在职员中推行“义务语学”考试制度，平日自学，每年举行一次统一考试，由日本参事官亲自主考和口试，成绩报伪国务院。考试合格的由伪满洲国出版的月刊《政府公报》公布，连续考3年仍不合格的，即予“免职”（日本人称开除公职为免职）。

日本人对伪职员的礼貌要求也很严格。送文件到科长以上的写字台前批阅时，要先将文件夹放在待批的文件木格上，然后退回一步行鞠躬礼。曾有的职员自以为是日本科附的“大红人”，送文件不行礼，贴到近前，嬉皮笑脸催着快批，竟被当众左右开弓扇了几个耳光。每天早晨见到参事官、主查、科附，在外行举手礼，屋内脱帽鞠躬，并用日语说：“哎哈哟勾匝依吗嘶”（早安），一般同事见面打招呼则只说：“呕哟嘶”（“早安”的简称）。

伪旗公署各科股均无权使用一角一分钱的经费，备品及办公用品均由总务科经理股统一购置、保管，需用时报表经本科及总务科长审批后才能发给。

六、伪旗职员的生活状况

伪职员的服装冬夏一律穿草绿或“国黄”色协和服（样式为翻领暗扣，四个明兜，背后一道横梁，后背及大小衣兜均有个折褶），富裕者用毛料制成，贫困的用黄棉布做。不属于“官公吏”的人，即使是富商、绅士、区划长也不许穿协和服。1943年后，无论大小官吏、日本人或中国人一律剃光头。伪旗公署的职员除旗长与日本人住公建的“官舍”外，其他人都是自建或租房住。单身职员几人同租一间民房作宿舍，自雇人做饭吃。

旗长和日本人住的官舍租金很高，由经理股按月从薪俸里扣，财务科征收股逐月到总务科和警务科提取官舍房租（绝无拖欠者，因欠房租罚款额很高）。对上级来人，省公署除厅级以上官员由总务科安排到街内大商号食宿外，其他人的食宿均自行安排。旗公署预算必须严格执行，预算外开支均为非法，无处核销。各科职员待遇标准均一致，毫无特殊。

职员去省或下乡“出張”一律坐“东亚公司”的公共汽车或大车，旗长有一辆四轮单马车。参事官去省里有专车接，旗长坐班车或轮船。下乡人员按“出張费”标准到总务科经理股报销，但必须有本科的股长、科长盖章。“出張”虽有补助，但职员到各村去，均由村公所给安排到当地商号或烧锅食宿，不必花钱。到各屯去，吃住在区划长、大财主家，也不用给钱。

1943年后，由于“圣战”告急，各种物资奇缺，伪政府给职员特殊照顾，不定期以配给形式卖给棉布或更生布、毛巾、袜子、手套、麻丝衫裤等。有时，一个科只配给铁锅、粗毛呢等四五只（块），职员们只得以抓阄形式决定给谁。每月定期供应的是香烟，诸如“大前门”、“华道”、“金砖”、“哈德门”等皆为市场抢购的高级烟。街上烟贩子与伪职员各有挂钩对象，配给烟下来，立即按议价标准转手给商贩，获利额超过一般职员的月薪，成为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

从总的情况看，靠薪俸过活的伪旗公署职员，经济状况拮据，因此，当时贪污、受贿成风，日本人根本无法发现。警察下乡抓“经济犯”、“思想犯”，“勒大脖子”自不必说。一般职员下乡催出荷粮、划开拓地、发放“鸦片吸食证”、“国民手帐”、财务滞纳金回收陈欠、缴收渔捐、马税、换车船牌照、征集劳工、勤劳奉仕队以及教育寒暑假办讲习班、统做操衣（校服）等，都给一些人造成了贪污受贿的可乘之机。

七、伪职员概况及思想面貌

从年龄上看，40岁以上的占25%，而其中财务科则占85%，被称为“老头科”。30岁以上的占45%，18岁以上的占30%。从文化程度上看，大学程度占2%强，中学占35%，小学占63%。从官级看，高等官占2%，委任官（包括试补、教谕、警长以上的）占23%，事务员（包括技术员）占6%，事务员补（包括技术员补）占24%，雇员占30%，临时雇员占10%。从国籍、民族上看，日本人占11%，蒙古族占13%，满族占2%，朝鲜族占1%，汉人占73%。从性别看，旗公署共有女职员11人，即：审议室1人，总务科5人，开拓科3人，行政科、地政科各1人，占总人数的5%。

就伪旗公署职员思想情况看，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甘做亡国奴，死心塌地为虎作伥，对日本人奴颜婢膝，年龄一般在30岁以下，委任官试补以上居多；警察、特务和金、阜州人占的比例最大，此类人占职员30%。

（二）无是无非、醉生梦死，有奶便是娘，吊儿郎当混，有暇时，热衷于谈麻将或发家致富生意经乃至色情下流事，绝不谈论国事政局，这类约占25%。

（三）身在曹营心在汉，当职员只为谋生，心中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对时局最关心。1945年伊始，《滨江日报》每日登载的“轴心国”与“反轴心国”的战况，已成为这些人每天最关切的事。他们约占总人数45%左右。

因时过40余年，追忆难免误漏，望当事、知情者予以补正。

（摘自《肇源文史资料》第一辑）

伪舒兰县公署的机构组织情况

黄景林口述

黎士杰整理

伪满舒兰县公署的组织机构，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统治需要，历经了几次变化。我是1937年（伪满康德4年）到伪舒兰县公署做事的。当时，县公署是在老县城（现在的朝阳镇）。伪舒兰县公署的机构设置是1个科3个局，科、局下设股。

庶务科：下设庶务股、经理股、文书股。

内务局：下设行政股、街村股、教育股、土地股、土木股、实业股、义仓。

财务局：下设理财股、征收股。

警务局：下设警务股、特务股、司法股、兵事员室。

1937年（伪满康德4年）以后，伪县公署内机构，把局改称科，又增设两个科，共6个科，科下仍设股。庶务科和财务科设的股同前；警务局改称科，除把司法股改为保安股外，又增设警防股；原内务局改名为行政科，除原设的股外，又增设动员股、烟务股，还把原街村股改名为地方股；把原内务局的实业股撤销，增设开拓科，下设开拓股、农产股、畜牧股、林业股；还增设经济科，下设经济股、工商股。

1940年（伪满康德7年）7月初，县公署由老县城迁至四家房（现在的舒兰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处于垂死挣扎阶段，伪县公署机构变化较大。警务科增设了无线电室，原行政科的动员股分出扩大为动员科，土地股也分出扩大为地政科，开拓科的林业股也分出扩大为林政科。县公署内设科已

达9个，一直到日寇投降。

另外，县内还设有协和会的组织系统，县有协和会本部（原址在现舒兰镇人民大路北，二商店东侧），在各村设有分会。它不仅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思想统治，而且还广泛参与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掠夺活动。县内还设有兴农合作社（原址在现舒兰镇建设路北，县医院东侧，即文化宫位置）。它是从生产和流通两个领域对农村和农民实行掠夺政策的机构。自从1937年12月把县日本参事官改名为副县长之后，逐步兼任了这两个日伪机构的头目。从1941年（伪满康德8年）起，推行地方行政总合化对策，采取了“三位一体制”，即县公署、协和会和兴农合作社等3个日伪机构，由日本副县长统一掌管。

伪舒兰县公署的人员编制是正、副县长2人，各科设科长1人，科下各股设股长1人，有的科、股设有日系科附、股附，余为科员。全县公署总计人员，初期约有八九十人，到后期多达200人左右。日寇为把我国东北变成永久的殖民地，在伪县公署的机构组织中采取了一些统治措施和毒害中国人民之策。仅举几例说明：

日人统治政权

在人员的安排上，正、副县长中安排日人为副县长（原名参事官），一切大政由日人副县长决策，实际权力居于正县长之上。在各个要害的科、股中都安排日本人掌握大权。庶务科和开拓科的科长都安排了日本人，以掌握全县公署和全县日本开拓团的大权。动员科是向全县要劳工、征国兵，直接为日本侵略战争供给劳役和兵役的部门，设日人科附，各股都设日人股附。这个股附的实权，在重大问题上要大于中国人的股长甚至科长（伪满时，把中国人都称作满洲国人，谁要说是中国人，谁

就是反满抗日，是政治犯）。庶务科的经理股是负责全县财政收支预决算的财权部门，除中国人任股长外，还设有日本经理官，名叫官川峰绿，一切开支，必须经他一人签字盖章核准，其他任何人即或是经理股股长也无权。警务科是分管全县治安、镇压反满抗日活动的地方警务部门，这个科也设有日人科附（又名首席指导官），各股也安排了日人股附（又名指导官）。这个指导官权力很大，中国人股长也要听他的摆布，他有权管教中国人的上级警官。警务科的兵事员室和无线电室都是军事的重要机关，故由科附直接管辖。警务科的人员都有警衔，按1943年7月的规定，最低的警衔是警士，往上是警长、警尉、监督警尉、警佐（股长级、署长级）、警正（科长级）等，阶级服从，一级压一级。经济科的经济股是负责全县物资管制与配给的部门。控制这个部门，对日寇掠夺中国物资有着重要作用。日寇调用了台湾籍的卢有用任经济股的股长。当时卢很有权势，他妻子叫×慈爱，在舒兰二道街北头（即现在舒兰镇民政街舒郊乡招待所的地址）开办慈爱医院。总之，扶植伪满政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做贼心虚，唯恐有失，所以对一些要害部门都安插上日本人和亲日的中国人把持，伪政府实为日本的傀儡政府。

政府是傀儡，人民则成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奴隶，任其蹂躏。据伪舒兰县警务科的王建勋介绍其亲身经历时说，1943年（伪满康德10年）8月，警务科科附鲇川茂（日人），为解决其私人朋友（日人）在黑河某地包工需要的劳力，随意下令，在一天夜里在舒兰街大肆搜捕所谓“浮浪者”，由夜间2时开始至早7时，共抓了三百多人。后来经我（王建勋）和邢警尉负责甄别，有一百三十多穷苦百姓找不到保人，得不到释放，而交给了他朋友派来的一个朝鲜人，被全部押送到黑河工地，送给鲇

川茂的朋友当劳工了。

实行文官令

为诱使在伪满政权机关做事的人积极效忠于日伪统治，与日本“一德一心”，于1939年（伪满康德6年）6月1日开始，实行文官令，在职员中定官衔。最低是佣员，往上依次是雇员、史员、委任官试补、委任官（又名属官，系股长级）、荐任官（分三等；三等和二等荐任官是科长级、一等荐任官系县长级）、简任官（分三等、二等、一等，多是在省和中央机关）等。定期组织考核，合格者可上升官衔，发给委任状，提一级工薪，就有高于下一级的地位。开拓科张亨元是三等荐任官，伪满建国大学毕业，精通日语。有一次，庶务科日人中岛找张给当一次翻译，张不答应，两人用日语吵起嘴仗来。在县公署的走廊里，张被骂激怒，举手就打了中岛一个耳光子，中岛反击，两人撕倒在地，滚打起来，惊动各办公室的人，出来给拉开了。此事轰动整个县公署，后经县长解决，因张是荐任官，大于委任官中岛而了事。

散布鸦片之毒

早在18世纪初，英帝国主义者为了毒害中国人民，大量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被我民族英雄林则徐烧毁，为扫除中华民族之毒害，立了大功。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之后，也继承了英帝之策，于1932年11月30日公布了《鸦片法》，1933年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下设专卖署和分署，还设立了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通过这些机构进行鸦片交易，低价收购，高价售于瘾者，用以搜刮和毒害中国人民。1940年，在各省、市设烟政科，并将原各地管烟所改为官营。伪

舒兰县行政科内设有烟务股，下面各村都有管烟所（俗称大烟馆），使一些中国人中了烟瘾，走上了害身之路。苗有方曾在舒兰警察署当过卫生警察，管过鸦片瘾者的登记和发证工作。瘾者有了证就可以凭证到管烟所买取和吸食大烟（鸦片）。据他介绍：“县行政科烟务股的股长是日本人，由他掌管鸦片的进入、包装小包（每一小包为一份，每份1.25瓦）和向各管烟所的发售等工作。”1939年（伪满康德6年），仅舒兰警察署管辖的4个管烟所（朝阳街一、二管烟所，四家房和天德管烟所）就有鸦片瘾者五百多人，以后还逐年增加。这4个管烟所，每天售出鸦片一千五百多份。另外，在二道河（现吉舒镇）、棒捶沟（现东富）和四家房（现舒兰镇）等地，还有日本权威者默许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开办的小当铺，秘密卖鸦片和吗啡。对无钱的瘾者，可用物低价抵押，三天还不上钱，抵押物就归当铺高价出售，从中渔利，毒害人民。每年严冬季节，都有些鸦片瘾者，身披破烂衣、破麻袋死于街头或破庙中。每年都发生十起八起。社会上为吸食鸦片的人送了这样一句话：“吸食大烟好不了，穷的快、死的早，临死抬着最轻巧”。真是一箭双雕，既榨取人民的财富，又毒害人民的健康。中上了大烟瘾的人，多是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伪满小城街朴永祥，因吸大烟而把家的一切物品，出卖净光，又把妻子儿女卖了出去，只剩下枯瘦如柴光棍一人，行窃作案，走上了犯罪道路。

1943年，日本侵略者面临侵略战争危机之际，为加紧掠夺中国物资，积极筹集劳动力。县行政科烟务股在小城街开办了所谓“康生院”，把吸大烟的人集中去戒烟，每期500人，两期就达一千多人。每期两周结束后，以劳动锻炼为名，全部押送到日本人开办的二道河煤矿，做无偿的无止期的煤矿劳工。

“火曜日”活动

日本把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日排成为月、火、水、木、金、土、日，火曜日就是星期二。日寇为控制伪政权中的中国人为日伪统治卖力，除采取正面以金钱、升官诱惑腐蚀和神皇奉戴的奴化教育之外，还采取了侧面监视的秘密办法，即“火曜日”活动。这个活动是日寇内部的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在每周二都要召开一次日人的秘密会议，决策大事并提出可疑人物。伪舒兰县“火曜日”活动时，参加的人员是县级各部门的主要日人和各开拓团的团长、警察署的署附（日人）、日人村长等。周二这天停止办公，集中到临时指定的地址，参加秘密会议。会议由副县长（日人）主持，首先是军事训练，表演武士道，然后集中开会。会议内容，一般是传达上司的旨意，决策大事，接着再由各部门汇报工作和中国人（包括县长、科长、股长、署长、村长）的公务情况、思想动向等。伪小城村村长王立斋是伪满前师范毕业的，当上伪村长之后，对当时某些事件有些抵触情绪，被日人小城署附汇报，扣上反满抗日的“危险分子”，登注在小城警察署特务系的“要注意人”的秘密名册上。特务侧面监视，每月要向县警务科特务股上报一次该人的思想、言论、表现和接触的人物等，结果于1944年5月被勒令带勤劳奉仕队去前郭旗服役。这就是日寇“火曜日”活动的宗旨，用以“密谋大事”和“肃反立正”，以加固日伪的统治和所谓“日满一德一心”。

（摘自《舒兰文史资料》第二辑）

日伪时期桓仁统治机构简介

白尔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侵占了辽吉黑三省。为了长期霸占东北，奴化中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设立了日伪组织机构。现将日伪统治时期桓仁机构设置情况简介如下：

一、日本驻在机关和单位

日本守备队，1933年进入桓仁县，约有200余人，队长叫野田，直属于关东军，主要任务是进行军事讨伐。初来时住在东关（现在的医药公司院内），后迁到西关飞机场。

日本宪兵队，宪兵队是随守备队一起来的，约有20余人，队长野田勇夫。其任务除监督日本守备队军人行动外，更主要的是干特务工作。其中有少数朝鲜人，除做翻译外兼有侦探任务，侦缉有反满抗日思想的人。地址在现百货公司所在地。

东边道特别工作部，1936年成立，专搞特务活动。工作部负责人是朝鲜人韩某。

日本领事馆，1934年来桓仁设馆，人员不多，都是日本警察。总领事矢野俊，副领事中村义夫。主要任务是保护日本侨民（包括朝鲜人在内），但也参加过屠杀和迫害中国人的罪恶活动。

桓仁县日本在乡军人会，会长高下定二，军衔少佐。这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负责退伍军人的生活、集训、调遣、分配等特殊任务，设在伪县政府警务科内。

日本航空株式会社桓仁县出張所，负责人是日本人白起。于1936年4月开始客运，每周定期通航三次，航线是从沈阳起飞，经由桓仁，再到通化，然后由通化返航，回到沈阳。这是桓仁县有史以来第一次空航。可惜的是，中国人买不到飞机票，只好望航兴叹而已。

满铁桓仁县出張所，所长日本人梅村逸雄，直属于满铁株式会社。负责铁路交通客运工作，在桓仁通化之间每天对开一次客车。后改为安东交通株式会社。

日本开拓团，是1940年移民来的，迁来农民六十户，二百六十多人，团长夏井永吉。开拓团直属于伪长春日本开拓株式会社。名目上是开拓种地，其实质是通过移民，侵占中国国土，同化中国人，达到“同文同种”的目的。

在满学校，是在1936年成立的，校长是朝鲜人金某。这所学校原是朝鲜学校，为了教育桓仁县朝鲜子弟而设立的。因日韩一体化，强迫朝鲜人更名改姓，遂把这所朝鲜学校，改为日本在满学校。

二、伪桓仁县公署

伪桓仁县公署，1932年成立，地址在现政府广场前。是县里最高行政机关，日本人担任副县长，拥有最高的权力。县长是傀儡，从行政系统来说他只能对县公署各科发号施令，不能对其它机关插手干预。县公署下设两个办公室、6个科，科下设股，分别主管各自分担的任务。

县长办公室，曾任过伪县长的有周鼎、常荷禄、王育文、刘清一。

副县长办公室，初成立伪县公署时叫参事官，后改称副县长。参事官三轮健儿，副县长是三盐末雄、石垣贞一、樋口一郎。

总务科科长堤信义，行政科科长张国权，财政科科长钟振北，实业科科长徐志新，地政科科长日本人崛永吉，警务科科长王本富。

三、桓仁伪协和会

桓仁县伪协和会，1934年正式成立，全称是“满洲帝国协和会桓仁县本部”。地址在桓仁街西门里，原是日本领事馆馆址，后为协和会办公地点。协和会桓仁县本部长是由伪县长刘清一兼任，副本部长由副县长日本人石垣兼任。实行所谓“二位一体制”，即伪县公署和伪协和会同属一个系统、两个机构。本部内设有司务长1人，由日本人担任，专职负责伪协和会事务。下设总务班、指导班、青少年班。另有“妇人会”、“军人后援会”两个外围组织。在基层按行政区划设18个分会，会长分别由18个街村长兼任。

伪协会有很大的欺骗性。利用这个标榜民意的组织，把所有机关和单位的头头都网罗在一起，听从日本人副本部长随意摆布。既可以独揽大权，又可以显示民意，这是日寇对伪满统治的手段。

四、县公署所辖18个街村和7个警察署

18个街村：

桓仁县街公所街长杨春华，二道岭子村公所村长董福先，横道川村公所村长王绍通，四平街村公所村长荣尚义，沙尖子村公所村长王芝田，五里甸子村公所村长陈晓江，六道河子村公所村长孙廷双，二户来村公所村长王禹川，华尖子村公所村长黄义忠，木孟子村公所村长袁裕民，八里甸子村公所村长吕之业，雅河口村公所村长姜春湖，普乐堡村公所村长魏永秀，泡

子沿村公所村长潘玉璞，拐磨子村公所村长马忠礼，北甸子村公所村长陆守田，业主沟村公所村长佟汇川，响水河子村公所村长曲元伯。

7个警察署：

城关警察署署长徐万程，横道川警察署署长黄贵福，沙尖子警察署署长范斌，二户来警察署署长孙学章，华尖子警察署署长黄金兰，八里甸子警察署署长教维国，拐磨子警察署署长朱文元。

五、县内其他机关和单位

桓仁县法院院长郜焕文，桓仁县检察院检察官梁澍霖，桓仁县税务局局长刘某，桓仁县邮政局局长赵纯，桓仁县电报局局长王华春，桓仁县电话局局长丁跃南，桓仁县专卖局局长王化清，桓仁县水电局负责人日本人。伪满中央银行桓仁支行经理卢鸿顺，及桓仁县兴农合作社、桓仁金融合作社、桓仁县柞蚕株式会社、桓仁县商工公会、桓仁县农务会、桓仁县图书馆、桓仁县南关师中学校（后改为南关小学）、桓仁县国民高等学校、桓仁县女子小学、桓仁县北关小学、桓仁县西关小学、桓仁县教养工厂、桓仁县大兴当、桓仁县协荣公司（经营桓仁丹东之间客运）、桓仁县林兴站、桓仁县管烟所、桓仁县监狱、桓仁县保安队、桓仁县二棚甸子铅矿。

六、宗教、民众团体方面

桓仁县基督教会、桓仁县天主教会、桓仁县佛教会、桓仁县道德会、桓仁县道院。

（摘自《桓仁文史资料》）

伪本溪县公署见闻录

谭会志

一、辽中大院

伪本溪县公署设立于1932年。县长陈荫翹，别名陈楚材；参事官高木一也；翻译野村一郎。陈荫翹辽中县人，是沈阳肇新窑业的财东，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当上了伪本溪县公署第一任县长。所有僚属，都安排上他的亲信、至友、乡亲，本溪县署遂有“辽中大院”之称。日本人占领东北后，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这样为在县衙的人事安排上任用私人提供了机会。

二、吸毒、贩毒

伪县衙内吸食鸦片成风。县长、科长、股长、科员、雇员、伙夫、工友中，吸食大烟、打吗啡的占大多数。因抽大烟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不乏其人。伪县衙经费来源主要是靠地捐。但当时治安不稳，没有人敢去四乡收税，为了增加财政来源就设赌场、办妓馆、烟馆，贩卖鸦片、吗啡，从中渔利。还允许种大烟，此举一箭双雕：一方面可增加税收，一方面毒害百姓。中国人都抽上大烟，就无力起来抗日，这是日本人又一侵略政策。

三、两个青年的堕落

伪县长的保姆姓罗，是个寡女人，只有一个儿子叫罗四维。

从小在陈家长大，念完中学，正好陈荫翘到本溪当县长，罗四维跟着来到县衙，当上文书股科员，专管“县印”。这个职务只有县长亲信才能充任。罗四维年方20岁，西服革履，出入县长公馆随便，不知底细的人，认为是县长少爷。罗四维和文书股打字员王××相爱，不久结婚，建立起小家庭，夫妻也还和睦。可好景不长，罗四维早晚伺候县长抽大烟，不久由“撮尖”、“抽头”，到吸烟而成为一个瘾君子。后来家产变卖罄尽，终于妻离子散，最后死在烟馆门前，由道德会买口薄棺，埋在乱坟岗。

文书股雇员方乐天，写一手好字，真、草、隶、篆，样样皆行，还会刻印章。也是陈县长带来的亲信。到本溪后结婚安家，生有两个孩子。方乐天因吸鸦片，烟瘾上来，什么也顾不上，被县衙解雇，到景记印刷局刻字。入不抵出，偷卖家中衣物，逼得老婆离婚另嫁。最后沦为乞丐，死于街头。

这两个青年因吸鸦片而堕落，当时社会上层人物对仇家采取的手段多是：拿钱供仇家孩子抽大烟、逛“窑子”。不出3年，保证叫他家败人亡。这是软刀子杀人，真是凶狠到了极点。

四、仗势砸戏院

伪县衙有一名老听差的，叫杨德春，伺候过多位县长，人很老诚可靠，他的儿子杨××，陈县长看在大老杨的面上，任命为雇员，在财务科当税收员，这是一个美差，有发财机会。杨××管征收戏捐。有一次酒醉到戏院包厢看戏，戏院掌柜没有奉献烟茶水果，引起杨××大怒，抡起板凳朝戏院掌柜砸去。响声惊动了正在演出的戏班和看戏的观众，不知出什么事，纷纷外跑。戏没演成，掌柜却遭毒打。第二天戏主到县衙告状。陈县长也觉得太不象话，把杨××臭骂了一顿。大老杨跪着求情，

县长息怒将杨××免职，到屠宰场去当工人。

五、庶务股长留笑柄

1934年3月1日伪满溥仪皇帝登极，全县召开庆祝活动。正赶上元宵节，举行提灯游行。河沿师范学校学生二百多人在体育老师谢永华带领下，拿着灯笼，走到县衙门前。谢老师在前头呼口号，同学们跟着喊：“啊——”这时站在县衙门前的庶务股长刘海川勃然大怒，大声吼叫：“你们师范学校学生都是哑叭，为什么不喊口号？现在我命令你们各校唱各校的国歌！”此言一出，同学们有的捧腹，有的捶胸，笑声一片，队伍顿时乱成一团。刘股长被激怒了，又连喊两遍：“各校唱各校的国歌！”这次因为声音更高，传的更远，引起看热闹的人大笑。有人将刘拉走。从此，“各校唱各校的国歌”传为笑柄。

六、榜首并非第一

1934年暑假，伪县长陈荫翹在伪总务科长王悦安、伪警务科长常庚尧策划下，举办一次全县秀才考试。由老学究王悦安命题：“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全县中、小学校老师和社会文人都来报名应考。考试结果，张榜公布，王悦安在榜前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两句话：“……白描取胜，自月旦之评，鹤俸客分略作花红点缀……”名列榜首的是县一小学语文老师商××（名忘记），第二名是碱厂小学著名老师沈曙东。商××是陈县长的老师，是随陈县长来本溪任教的。被陈县长亲批榜首，这不是白描取胜而是朱批列首。沈曙东应列前茅只好屈居第二，没有受到花红点缀，人言纷纷，引为怪论。

七、羊能不能上树

1934年春，伪县警务科长常庚尧、伪警管训练所长常伯英（是常庚尧的家侄）出示布告招考伪警，报考者须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我受伪警务科科员王奎多邀请，替别人应考（我在河沿师范念书），我顶替谢××去考试，坐在我左右两个人照我答卷抄录，王奎多监堂，看着不管。考试科目有语文、数学、常识三科，语文题是常庚尧出题：“有志者事竟成”和“人贵有恒”两题，可以任选其一。很多人有“小抄”，照着抄。在口试时，要对相片，我不能代替，必须应考本人应试。口试主考人员有日本指导官和伪警务股长范希文，日本指导官问应考者：“羊能不能上树”有的答：“不能”，遂被淘汰。有人答：“羊能上树。”日本人问：“为什么？”其人答：“我可以抱着羊送上树”，竟被录取。

八、冀东文官

1935年伪本溪县长陈荫翹调走，继任伪县长王荫椿到任。王荫椿，冀东滦县人，自称是冀东伪政权大汉奸殷汝耕的亲属，汉奸王克敏的家侄，曾任冀东参伪组织“冀东四民治安维持委员会常务委员”。“四民”是指“仕、农、工、商”。王荫椿借助日本侵华军司令官梅津的势力，当上了伪本溪县长。到任后住在伪县公署后院伪县长公馆内。本人和妻妾三人，都吸鸦片；还有家属和佣人20余人。王荫椿大高个，常穿蓝缎子团花皮袍，外套青绒大花马褂，头戴一顶帽头，红帽疙瘩，佩上一块玉石眼，戴一付墨镜。从外表上看很神气，象一个当官的样子。实际脑子里一点墨水没有，是一个斗大字认识不到两石的白字先生。

1937年5月2日，伪满皇帝溥仪东渡日本认亲回来，发布了

《回窑训民诏书》。训令各省、市、县长接诏捧读。诏书用黄缎子包着，王荫椿双手接诏，举过头顶，轻轻展开，全县伪官吏俯首听读。王荫椿读诏书时，一句一个错字，把“回窑训民诏书”念成“训民回舍语书”不知什么意思，把“联”字念成“月”字，“亟”字念成“承”字，一篇诏书，念的驴唇不对马嘴，谁也听不懂。以后组织学习，由总务科长老学究王悦安领念，才发现王荫椿念的错别字太多，怪不得谁也听不懂。从此群众给他送个外号叫：“冀东文盲”。

九、“喝你妈的尿”

王荫椿春节时，请一些商号老板来赴宴，从午后1点开喝到上最后一道菜“八珍海味汤”时已经晚8点多了。听差的任庆春有点疲劳，端着这碗汤刚一过门坎，看见县长不高兴，瞪眼珠子，吓得任庆春两手一颤，一不小心将碗掉在地上，双耳细瓷碗打碎了，汤也洒了。王荫椿一看勃然大发，大骂任庆春说：“你是废物，一碗汤都端不动，把我这宫廷宝贝的双耳碗打碎了，汤也洒了，拿什么给客人喝，喝你妈的尿?!”任庆春赶紧回答说：“是，县长，喝你妈的尿。”王荫椿一听更来火了，大骂：“你妈妈的是混蛋，喝谁妈的尿？喝你妈的尿!”任庆春这时才有点明白，急忙回答：“是，县长，我是大混蛋，喝我妈的尿。”弄得满桌客人，啼笑皆非，赶紧掏腰包给赏钱来解围，任庆春接过赏钱，连说：“谢谢!”王荫椿端起茶杯说：“送客”。等到客人走后，任庆春将赏钱五百多元，交给姨太太，姨太太拿出10元钱对任庆春说：“给你5元，给厨师5元”。这场“喝你妈的尿”宴会，令人哭笑不得。

十、“友邦”变“亲邦”

伪满初期，一些伪官吏，管日本帝国主义者叫“友邦”。后来伪满皇帝访日认亲，承认日本是“亲邦”。王荫椿接到旨意后，在早操训话时说：“从现在起，对日本国民的称呼不准再叫友邦，要叫亲邦。王荫椿认贼作父，厚颜无耻，从此说话时张口“亲邦”，闭口“亲邦”，二字成为他的口头语，叫的肉麻。

十一、疗伤不付钱

王荫椿对日本侵略军，经常去慰问，翻译程远鹏和各科长轮流随行。有一次王荫椿带着教育科长高凤翰，翻译程远鹏等人乘坐一台大板车和一台小轿车去碱厂慰问守备队。高凤翰坐在大板车上，走到八盘岭下坡路拐弯时翻了车。将高凤翰右臂砸坏，司机没有受伤。王荫椿将司机臭骂一顿，带着高凤翰坐他的小轿车返回本溪湖街，急忙找金玉山的父亲金恩祥老大夫给治疗，经过金家膏药铺祖传名医的精心治疗，总算保住右臂，没有残废。高凤翰用治好的右臂握笔亲书：“痊愈右臂”4个大家，做了一面锦旗，亲自送到金府致谢，从此再也不敢下乡了。伤臂治好了，医疗费却分文未付。

十二、解剖活人

1937年6月，王荫椿领着翻译程远鹏去连山关守备队去慰问。连山关守备队长接过送去的礼物，亲自领着王荫椿、程远鹏到守备队院内去参观。当时驻在连山关的守备队兵舍，占地很大，四周筑有土堤，四角设有暗堡，警戒森严。日本警备队经常四出骚扰，乱捕无辜，枪杀或喂狼狗。老百姓不敢从门前走过，要绕道走，守备队兵营成了杀害本县人民的魔窟。守备

队长领着王荫椿到各兵舍看了一遍，又领到一处监房，将门打开，让王、程两人进去看看。两人进屋一看，吓得直哆嗦，原来这是一所刑房，撮着各种刑具。在梁上还吊着一个人，赤身露体，满身伤痕，口流鲜血。守备队长哇哇大叫问王荫椿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王荫椿吓得魂不附体连说：“不知道”！守备队长指着梁上悬吊的人说：“你是什么人？”那个满身伤痕的人睁开眼睛说：“我是朝鲜人”。守备队长说：“你是反满抗日的罪犯，还不老实交待，我要将你打死！”那个朝鲜人说：“要杀要砍随你的便。”守备队长野性大发，用大刀将那个人两个耳朵割下来，又去割舌头……这时王荫椿、程远鹏两人吓得倒在地上昏过去。等他们两人醒过后一看，不是监所是守备队长办公室。守备队长笑呵呵地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是满洲国的功臣，为大日本帝国效劳，我不会加害你们。那个朝鲜人不听我们的话，让他在朝鲜当县长，他不当，跑到东北来抗日，已被我解剖杀死。”王荫椿临走前，守备队长又一再训示：“今天看到的情况，不准对外透露，如敢说出去，叫我知道，也休想活成。”王荫椿连连表示：“遵命，绝不透露。”就这样王荫椿和程远鹏两人灰溜溜地回到本溪。吓得一场大病，差点死去。

十三、追悼死婴

伪参事官浅子英的老婆生下一女孩，未满月就死去了。按日本人的规矩，不论老人、大人、小孩死后都要火葬，有条件的还要开追悼会。王荫椿抓住这个机会，对浅子英表示深情厚谊，亲自到浅子英家去吊孝。臂戴黑纱，胸戴白花，还送了一个花圈，向生未满月而夭折的死婴遗体告别。行了三个大鞠躬礼，烧了三柱高香，眼流长泪，泣不成声，如丧考妣。岂知王的举动还真得到了浅子英的青睐，浅子英在职工大会上说：“王

县长不愧为一县之长，很懂礼貌，对我刚生未满一月的女孩死亡，亲自参加追悼会，悲恸万分，值得表扬和赞许！”

十四、庆混烧香

1937年9月王荫椿被免职，由辽中县长关庆琨继任本溪县长。关庆琨，义县人，中等个头，微胖。穿一身协和服，头戴协和帽，帽徽是一个“王”字（代表王道乐土的意思）。顺他头部往下看，一双眼，高鼻梁，大嘴，留着一撮八字胡。仔细一端详原来是“王——八”县长。关庆琨早在辽中时候，竟做一些混蛋事，老百姓故意将“琨”字读白“关庆混”就成了关庆琨的雅号。

关庆琨到县任职后，自标高雅，好养花，好供佛。从辽中县拉来一汽车菊花，撮在县长公馆院内花墙上。花姿百态，五彩缤纷，确也有一番风味。关庆琨到任一个来月的一个礼拜天，在他的高所院内举办一次“赏菊披露”。关庆琨在宴会开始时致词说：“今天到会的各位，都是我的部下和地方绅士，希望大家知道我的脾气。我这个县长，是有警察权的县长。别看在日本人面前，我什么大事也不敢管，是一座佛像。但既然是佛，就得有人给我烧香还愿。谁要瞧不起我，不给我面子，别怪我不客气，我就抓他头痛、骨头痛……”从此“庆琨烧香”的外号就传开了！

十五、赵长庆遭殃

总务科会计股科员赵长庆，是主管前渡资金的会计。是日本的高等小学校毕业，精通日语，沈阳人。身高1.80米，外号叫赵大个。赵长庆担任前渡资金会计，是县委任官以上开支的会计，凡是国库开支经费，都由他办理。有一次关庆琨下乡回

来，要报公出旅费，赵长庆拿过单据一看，公出天数不符，多报3天，就没有给报销。还在日本经理官斋藤面前告了关庆琨一状。日本经理官斋藤对关庆琨的报销事提出疑问，并狠狠批评了他一顿。因此关庆琨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赵长庆也不争气，自待会日语，哥哥赵长生是伪牡丹江市长，也养成一身坏习惯。学会抽大烟，还嫖野妓暗娼。事被关庆琨知道，就找警务科司法股长张连惠商量对策。张连惠外号“张黑子”，是关庆琨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爪牙。正好张连惠也对赵长庆不满，是为一个暗娼，两人争风吃醋吵过架。张连惠找到机会，得到关庆琨批准，就下毒手，将赵长庆抓起来，送到监狱拘押了6个多月。直到赵长庆的哥哥赵长生（伪牡丹江市长）来本溪找到关庆琨说情，关庆琨才让张连惠将赵长庆释放出来。赵长庆赌气不干，回沈阳另谋出路。

十六、泉水村长被捕

关庆琨到任1年多，各伪警察署长、伪街村长，怕不烧香还愿，遭到迫害，逢年过节，都来送礼。关庆琨感到我这座佛像到底是眼通六路，耳听八方。权招天下士，都是烧香人。后来关庆琨发现泉水河村伪村长谭广吉没有见过一次面，也不到家烧香上供，这还了得。关庆琨通过财务科长乔恩润，才知道这名村长的底细，原来他的儿子谭会忠是会计科员，从来不到上级家送礼。何况谭会忠在审查经费报销时，也对关庆琨报销单据提出过问号。又经过多次了解，知道谭会忠不过是一个小小科员，没有什么保护神。于是找张连惠研究对策。张连惠说：“这事容易，交给我办，我就说谭广吉参加过赌博，可以抓来拘留。”不多日，张连惠在街上遇到谭广吉，就说：“找你有事，你跟我到警务科来。”谭广吉到了警务科，张连惠硬说谭广吉在广

泰盛打过麻将，参加赌博，下令拘留。谭会忠得到父亲谭广吉被拘留消息，马上找财务科长乔恩润请求办法。乔科长说：“这事我知道，关县长对你父亲不满，对你也有意见，才让张连惠拘捕。你赶快找泰盛经理李梓薪去关县长家说情。”谭会忠连忙照办并送了100元现大洋。关庆琨说：“谭广吉爷俩瞧不起我这县长，我就得给他们点惩罚，现在你来说情，看在你的面上，可以放人。”谭会忠给张连惠家送去一台松下牌收音机。当天就将谭广吉释放出来，气得谭广吉辞去伪村长职务，去经营煤矿了。

十七、岗元大打出手

关庆琨进财之道除“吃供”外，还常在家设赌抽头，私开大烟馆。赌徒烟客大都是各伪警察署长、伪县署各科长及股长、县衙大商号经理和社会上一些地痞、流氓、绅士等。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闹得乌烟瘴气，满城风雨。1938年春节后，一个星期六，关庆琨又下请贴，请县公署内各科长、股长以上伪官吏，还请日本人指导官、科长等多人。在伪县长公馆东屋设两盏大烟灯，西屋设两张麻将桌，宾客抽大烟的喷云吐雾；打麻将的红中发财。宴会还没开始，警务科警务股日本人指导官岗元手拿请贴进院。关庆琨在门口接待，让到西屋，岗元进到屋里一看，麻将桌上坐着两男两女，正在洗牌码牌，谁也没起来让坐。岗元怒从心来，大骂“叭嘎”，抡起双手，对准两对男女各打两个大嘴巴。并让男的跪下，又用皮靴踢了一顿，踢后愤愤而去。东屋烟客一听西屋岗元大打出手，赶紧将烟灯吹灭，收拾起来，没敢出屋。由于岗元闹宴，不欢而散。这两个男人是伪县公署土地股长李如芸和绅士阮通谱；两个女人是本溪有名恶棍黑帽子衙门日本人走狗姜兰一的小老婆，和日本宪兵队翻译依立峰的老婆。星期一刚一上班，岗元就去找参事官三松

泰助报告了这事，还要找关庆琨、李如芸算帐，吓得关庆琨坐在县长室内不敢吱声，参事官考虑到和中国官吏的关系，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劝岗元息事宁人。劝说岗元要照顾县长面子，岗元才怒冲冲地回到警务科。此后，关庆琨再也不敢去请日本人到家赴宴了！

十八、监狱变赌窟

关庆琨在岗元闹宴后，不敢再大张旗鼓地来设赌场。就和警务科长于文治商量，暂时搬到他家去赌钱。于文治家住在县长公馆下院，一墙之隔。互通声息，避开日本人耳目之后，赌风更盛，赌法更多，更为活跃，由打麻将、耍牌九，上升到打桌面——玩扑克。扑克赌博是日本人传过来的。人数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赌徒群集到于文治家，这种赌法是每人先分两张牌，一明一暗。在分第三张牌前必须再放下赌注或筹码。有的人看自己牌没有奔头，就放弃不跟了。这样到第五张牌时，剩下的人就不多了。最后五张牌决定胜负，关键是扣着那张牌，如果是“娇客”（大王）就有绝对胜利的把握。这种赌法，在当时所谓上层人物中颇为流行，一般人赌不起。

岗元对关庆琨行为不满，组织伪警去抓赌，没有抓到，就认为赌风利住，再不过问了。这些赌徒在于文治家赌了一段时间以后，认为于文治家是临街房不保险，想另找地方。监狱秦典狱长趁此机会，极力怂恿到监狱办公室去赌。至此，这帮赌徒每晚7点多钟进去，第二早7点前出来，夜间还有酒席款待，就再没有人再去抓赌了！伪官吏为赌博，可谓绞尽脑汁。

十九、两股长出走

日本人对县衙内部职工控制审查甚严。会日语的吃香，有

靠山的得混。会计股长黄崇原、征收股长王学志两人，既不吸毒，又不赌钱，为人正直，但不会日语，又不到关庆琨家上供烧香，关庆琨就有意陷害。1939年3月诬黄、王二人有反满抗日言行，进行政治迫害，打算逮捕。事被财务科长乔恩润知道，通知黄、王两人急速躲避。黄、王两人趁赴沈阳开会之机，逃之夭夭。过了几天，黄、王两人没有回来，关庆琨知道消息透露，可能出走，就向日本人报告：“黄、王两人潜逃。”日本人到家搜查，室内空无一人，连家属也不知去向。事隔6年以后“九·三”胜利，黄、王两人才从内蒙农村回来，未遭毒害。

二十、株连无辜

1939年7月，警务科会计日本人佐田和伪警何庆忠3人，由银行取回全县伪警开支款2万多元伪币。因礼拜六下雨没有发出去，锁在办公室金库内。原警务科被解雇电工王连恩知道取、存款日期。这天晚间警务科没有值班人员，王连恩潜入会计室内，用电工工具将金库破坏，盗取全部现款潜逃。第三天上上班，发现金库被盗，司法股长张连惠向关庆琨报告。关庆琨大发雷霆说：“这个贼胆子不小，敢到警察局作案，可能是内部职工作案，要立即动手清查。”张连惠领着一帮刑警和狗腿子将全县公署人员名册拿去，逐个进行审查。凡是过去有劣迹的，如耍钱、嫖娼、酗酒、钱财来路不明的人都列为怀疑对象。会计股科员冯光宇主管工资发放，好赌博，娶妓女为妾列为第一名，由张连惠亲自抓去审问。冯光宇那天晚上在家打麻将没有出去，找来那天晚上一起打麻将的人作证。张连惠就追问那几个打麻将的人，没有得到什么证据，就将这几个人暴打一顿释放。工友徐殿阁平日赌钱出名，是个穷光蛋，疑其有作案的可能，也找去审问。因作案那天这些人都在某处赌博，就抓了一大片，因

没有足够证据，打了几下，都被赶回去。警务科日本指导官感到警务科被盗是个耻辱，必须急速破案。无辜群众被抓、被押不知多少，遭受毒打、受刑的更有其人。大海捞针，上哪找去。过了3年多，王连恩在安东市被捕，才供认这次偷盗经过，但是时过境迁，窃款已大部挥霍，不能追回，这场被盗大案，才算结束。

（摘自《本溪文史资料》第四辑）

统治阿城六年的岸岳五郎

秦绍儒

四十多年前的伪满时期，我曾在伪阿城县公署行政科保健股当过雇员（当年20岁）。还有王全忠、刘万良、唐荣跃、邵仪唐、张德奎等人，也都在县公署、村公所等处做过事。为了使后人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去，我们几个人，对岸岳五郎在阿城的所作所为，就身验目睹的一些事件进行了回忆：

一、岸岳五郎在阿城施展的 “怀柔政策”和“绞椎政策”

1939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从日本遣送来一些日民，在平山、玉泉、双河等地建立了开拓团。当时就遭到中国人的反对。在双河村所建开拓团占地时，以王文阁为首的二十多人进“京”（当时的新京，现在的长春）告状，反对日本人没收农民的土地。伪满国务院的日本人松木秘书官接待告状人时，他说：“五十著真一（伪满时阿城第一任伪副县长）领导不了阿城县，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他就要调北安去了。岸岳五郎就要到你们县去

当副县长，他是我的老朋友，他会有办法解决你们的问题的……”

1940年，岸岳五郎是带着一个中国人老婆来到阿城的。来后，他兼任了双河村副。一次，他来双河村，副村长陈××陪他喝酒喝醉了。陈副村长让邵仪唐照顾岸岳五郎睡觉。岸岳五郎对邵仪唐说：“我来阿城当副县长，是因为阿城县刁民大大的，不好治，所以让我来治。”又说：“我是皇族、浪人，我还是新京妓女院的后台老板……”。

那时的岸岳五郎已五十多岁。他来阿城推行的是一套“怀柔”政策。对县长温继桥（中国人）毕恭毕敬，让温县长在正面的大屋办公，他在旁边的小屋办公。每次在公开场所，他不但同温县长一起走，还把温县长让在头前，如遇到路不好走或上楼梯，他搀扶着温县长走。在大会场上讲话前，要先让温县长。

岸岳五郎在对伪县公署机关实行了一套“怀柔”政策的同时，安排了大量日本人在一些单位任职。如总务、警务、行政、财政、地政等五个科的科长是中国人，但科副都是日本人，决定问题的大权却掌握在科副（日本副科长）手里，又如行政科的勤俸股（即当初的劳工股）股长为汤浅、工务股长为丸岗、国兵民籍股长为矢口、保健股和街村股长森正二，这些日本人都直接执政。日本人为了便于监视中国官吏的言行，一科几十人，从科股长到大小办事员，全都在一个大屋办公。不但科股长由日本人统治着，到县长那级也是日本副县长岸岳五郎说了算。在一切公文上加盖公章时，只要说副县长已经批过了，县长就叫盖章了。

岸岳五郎来阿城不久，就决定给县公署的伪职员，每人发一套青布衣服（那时候棉布已实行控制，也没有卖的）。据王全

忠同志说：“1942年（伪康德8年）夏天，岸岳五郎带领全体伪职人员去大河洗澡，他和中国人学游泳、练球，还曾组织一次到北门外打猎。特别是在一次大会上宣布：日系人不准打满系人。”

岸岳五郎在阿城县稳住脚后又实行了一套“绞椎政策”，也就是一步比一步紧。他对伪县乡署机关人员宣布：谁也不准迟到和早退。每天早晨必须开“朝会”，在会上升国旗，唱国歌，向西南遥拜“皇帝”；向东南遥拜“日本天皇”，宣读诏书，长官训话。有来晚的人，必然打一顿，骂一顿。为惩罚伪职员又命令总务科给他做了一个“神棒”，即一根四至五公分粗的，两米来长的木棒，一头挂有红绿纸条子，并宣布：“上楼梯不准出响动”。有一天，玉泉警察署张署长穿着一身警服，挎着洋刀，穿着一双带有刺马针的皮马靴，神气十足地走上楼，因马靴踏地板和楼梯发出响声。岸岳五郎走出他的办公室，不但大加训斥，又回到办公室拿出“神棒”，劈头盖脑地把张署长打了一顿。打后走下楼梯，找到看门的靳鸿儒，也给他两“神棒”。

1945年（伪康德12年）夏天，岸岳五郎在县公署大院给劳工开大会，机关人员在楼内办公，我在练钢笔字。会刚开完，岸岳五郎就气势汹汹地来到楼上我的办公室问：“刚才谁说笑啦？”这时候，人们都起立，默不作声。他问过一通又一通，因为我们这个办公室根本没人说笑，所以也没人承认。于是他责成国兵民籍股长矢口（日本人）追查到下班，也没追查出来。这时教育科的马永吉用日语对矢口说：“是我说笑来的。”（实际他没说笑），矢口听了，马上去后院副县长家里汇报。待矢口返回来，代表岸岳五郎打了马永吉一顿嘴巴了事。

1942年（伪康德9年）秋，岸岳五郎到蜚克图村去催出荷粮，他在村、区、屯的三级伪官吏大会上讲了春订的征收出荷

粮标准，不但要交足纳够，还要交出好粮。曹家窝棚区的区长曹长霖，站起身走上前去，给岸岳五郎来了个90度的鞠躬礼之后说：“县长，今年早霜，庄稼没上来，实在是打不出那么多的粮食，请副县长开开恩，让我们少交些粮吧！”岸岳五郎听了，勃然大怒，命令派出所齐所长把曹长霖带走。吓得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再提少交出荷粮了。当岸岳五郎回县时，把曹长霖带走了。

二、岸岳五郎所宣传的“协和”、“亲善”

岸岳五郎来阿城不久，就自己撰写了一本名叫《教示县民》的小册子，其内容，一是说明日本人来东北不是侵略，是为了拯救“满洲人”，建设“王道乐土”、“日满亲善”；二是说明台湾原名叫蓬莱岛，这个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等等。后来，岸岳五郎的这个册子大量地出版，不但每个伪职员人手一册，还发到各个部门和村、区。

岸岳五郎每年至少两次到全县的各街、村去开大会。凡他要去的街、村，必须提前排队迎接，小学的师生也要列队迎接。有一次，他去开大会，有些人去晚了，他命令村长李芳对姚百福等迟到的人逐个打嘴巴，列队迎接的人行90度鞠躬礼之后，就开始听他的训话。除宣传他的小册子精神外，还讲：“我是你们的父母官，见到我鞠躬行礼，我也给你们还礼，你们不赔帐。”

1943年（伪康德10年）夏天，在东门外的运动场上，召开锄草班动员大会。岸岳五郎看锄草班队伍里有些人超过五十多岁（规定50岁的人不参加锄草班），他立刻宣布：“超过50岁的人站出来！”并追问：“是谁让你们来的？”当场又向街区长宣布：“该来的人不来，要押起来！”

三、岸岳五郎所建的傀儡机构

为了维护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岸岳五郎还在阿城建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就是“日满协和会”。中国人都叫它“蝎虎会”。协和会的表面任务是搞什么“日满协和”、“日满亲善”、“宣德达情”。实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搞特务活动，监视中国人的言行。所以那时从县、村、区都建有协和会组织，并发展协和会的会员，会员都穿着“协和服”。协和会直接掌握社会名流和政治嫌疑分子的动态，并把这些人列入“要人”名单，名为“视察人”。

岸岳五郎还独出心裁地建立了“增产班”、“锄草班”、“互相帮”以及城镇各行各业的“组合”等，把中国人统治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形成了一整套的监视网。

所谓“增产班”，是由伪县公署官吏组织起来的，由科长或科副任班长，每村去一个班。从春耕、夏锄到秋收送完出荷粮，一包到底。增产班一下乡，人们怕而敬之，怕他们往死里要出荷粮，因而不得不恭恭敬敬，到处都得用好吃好喝招待，得意啥给啥。招待不好时，就大发雷霆。如：伪县教育科长王宝合，他担任永源村增产班长，他到了一个屯子，正碰上一家办喜事。由于招待不周，他大发雷霆，把酒席桌给掀翻在地，当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愤恨。

“锄草班”，是把城镇居民50岁以下的男人强行组织起来，在夏锄季节，下乡帮助地多的地方家锄草。名义上是帮助铲地，实际上，都是白给地主铲地。

“互相帮”，是从1945年（伪康德12年）开始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每十多户为一帮，每帮有一名帮长，名义上是互相帮助种地，实际上是为了多要劳工。岸岳五郎又发给每个帮长

一套黄色肥大的衣服。

“组合”，是在城镇按行业组成的，什么饮食业组合、商业组合、手工业组合、柴炭组合等，各组合都有“官吏”参加。如伪满“官吏”徐锋，看到成立组合有油水，便买通了农业科日本人中山猛彦、警务科特务股长管井等人，在城镇里成立了柴炭组合。从此，阿城镇再不准有人随便买卖烧柴，实行了城镇居民烧柴配给制。烧柴由柴炭组合统一经营。同时，也出现了柴炭组合人员的贪脏受贿。

四、反岸岳五郎的斗争

自从岸岳五郎来阿城任副县长以后，阿城出的劳工数量一年比一年多，城乡人民反对出劳工的办法也越来越多了。城乡人民都不愿意出劳工，他就成立了“互相帮”，来解决出劳工人家无人干活的困难，但是人们还是不愿意去。他就亲自出来动员，并派伪职员带队。

岸岳五郎向农民要的出荷粮年年增加，农民反对要出荷粮的做法也越来越巧妙。岸岳五郎为了达到多收粮，采取了对送出荷粮的农民给布的手段。另外，给送粮的大车老板子每人两张大饼和二两白酒。送出荷粮时，岸岳五郎还到饭店去看看饼的份量够不够，白酒烫得热不热。为了多方严格控制粮谷，岸岳五郎还出马大抓“经济犯”。唐荣跃的家住在石槽村，在1943年时，为了还债，卖了几麻袋大豆，岸岳五郎便派警察把他抓了起来，不仅蹲了监狱，还罚了1千元钱（相当于一个伪职员二年的工资）。徐成业是伪县法院职员，据他回忆：1941年春季，由警察署一次送交检察院四十多名“经济犯”。当时的检察官赵俊臣决定：一律免于起诉，无罪释放。警务科一个日本人指问“检察院为什么把‘经济犯’全部释放？”赵俊臣当场反问：“在

日本国的老百姓买烧柴，你们都给制了什么罪？”这个日本人无言答对。

岸岳五郎在阿城时，步步加紧了对粮食的控制。城里人的吃粮有限，只逢年节配给点白面，大米一点也不给。谁若是私买粗粮就是“经济犯”，私买了大米就是“国事犯”（因为大米都是军用的）。那时，在大年三十，做一顿大米饭吃也是心惊胆颤的。总怕被警察发现，还要另做一盆高粱米饭，摆在桌子上。边吃大米饭，边不时地向外看。如果发现警察来，就立即换上高粱米饭。

岸岳五郎在统治阿城县的6年当中，施展了种种统治手段，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建设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出了大力，受到了日本统治头目的赏识，并请他到“新京”介绍统治中国人的“经验”。伪滨江省要调岸岳五郎去省里当警察厅长。尽管岸岳五郎的统治手段很高，但却掩饰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全县人民纷纷要求人民政府严惩岸岳五郎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分子。1946年1月，阿城民主政府召开了公审大会，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岸岳五郎。

（摘自《阿城文史资料》第二辑）

榆树县伪副县长 日和崎栋男其人

宋晓峰

日和崎栋男，在伪满曾任榆树县副县长，是日本侵略势力在榆树的总头目，是双手沾满榆树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日和崎栋男于明治42年（1909年）8月，出生在日本国高知县香美郡山村的房吉二男家族。时值明治维新鼎盛时期，军国主义教育遍及全日本，所以日和崎栋男从懂事时起，就受到“武运长久”和“大陆政策”等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昭和8年（1933年）初，他取得东京大学法科毕业文凭后，即被派往中国，加入了侵华战争的行列。

据《满洲绅士名录》载：“日和崎栋男，大同2年（1933年）至康德5年（1938年）3月任兴安总署属官，科尔沁左翼中旗属官，科尔沁左翼前旗参事官。康德5年3月，任省事务官，兴安南省警务厅特务科长”。从上述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日和崎栋男的特务身份。不仅如此，日和崎栋男在来榆树任伪榆树县副县长时，始终也没停止其特务活动。1941年3月，他被派到榆树，在同年11月，就在原榆树县警务科特搜股的基础上，组织了一个高级的情报组织——特搜班。特搜班的班长由特务股长九岛××和秋业义雄（均系日本人）先后担任，下有15名班员，由日和崎栋男拨以专款作为特务班活动经费。此外，还由这些班员在流氓地痞中发展特务密探，在全县范围内设十个特务活动据点，用来监视人们的社会活动。

在情报上，日和崎栋男还有他的另一手，就是发展弘报员和弘报要员，建立弘报小组。在日和崎栋男到榆树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建立了两个弘报组织，专门用来搜集信息，监视反满抗日的言论和行动。据有关资料载，194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十二支队长杨文清来榆树活动而被追捕，就是由弘报小组搞到的情报提供给特搜班的。

日和崎栋男还是一个掠夺人民财富的强盗，屠杀广大人民的刽子手。据当年的伪职人员在1961年的回忆，日和崎栋男一到榆树，就大量接收出荷粮任务，强迫农民低价卖粮。每到冬季，抽出县公署各科、股长和经济部门人员，组织出荷督查班本部，分组到各村逼着农民要出荷粮。给警察起个名称，叫兴农警察。各个农村派出警察督促农民春种、秋收、征集出荷粮和各种物资，其中包括军用马匹、车辆、劳工、勤奉队，都要超额完成任务。如有一户不完成“任务”，轻者抓起来充为思想犯，关押6个月；重者定“通匪罪”，有钱买命，没钱的枪杀、砍头或活埋。更有甚者，他有时下令将砍下的中国人的头衔在马嘴里或挂在树上，以示不完成任务或抗出荷的下场。

由于日和崎栋男在榆树完成日本侵略战争所需的各项物资任务积极，“成绩良好”，屠杀中国人民有功，在1943年其官衔升为简任二等，勋六位，超越一般县长，相当省厅长级。

1945年“八·一五”光复，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日和崎栋男逃回日本。

（摘自《榆树文史资料》第二辑）

敦化县日本参事官惨杀抗日军民

查讯检举人张振华笔供录

(1954年11月17日)

为了查清伪满吉林省敦化县参事官荒川秀次命令指挥部警察、自卫团等配合前日本宪兵队，在敦化县城、郑家屯等地惨杀我抗日武装人员及和平居民的罪行，敦化县人民政府梁玉福于1954年11月15日讯问了检举人张振华。张振华自称44岁，职业伪警察，家住吉林省敦化县第四区红石砬子村，现在吉林省第一劳动改造大队劳动改造。

问：你认识荒川秀次吗？

答：认识。他是1935年初调来敦化县充任伪参事官，于1936年调离敦化县。他在敦化县曾命令指挥其部下警察、自卫团等惨杀了中国抗日武装人员及和平居民。

问：请你把荒川秀次指挥命令部下警察、自卫团等在敦化县惨杀中国抗日武装人员及和平居民的情况谈一谈。

答：1935年春天，抗日联军陈翰章部队的战士来敦化县城筹集粮食。荒川秀次得到这一情报后，即命令部下警察、自卫团和日本宪兵队进行了3次大搜查。搜查结果，在敦化县城东关的旅馆内搜出抗联战士4名、和平居民9名。这13名被交给日本宪兵队之后，宪兵队把其中的抗日联军战士4名、和平居民2名，在敦化县的北山上用日本刀砍杀，其余7名不知下落。

又在1935年的冬天，荒川秀次命令指挥部下警察、自卫团等150名和伪军一个连，包围了驻在敦化县郑家屯的黑龙抗日部队战士20名，其中11名被逮捕，最后被枪杀于郑家屯西北的炮台附近。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东北“大讨伐”》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

日本参事官妄杀伪汤原县县长

沈五和

日本人制造的伪满洲国凡是机关团体的主脑人，由溥仪当皇帝起，全由汉奸充当，做为傀儡、牌位，只受香火不可喘气。次一位都以日本人充之，掌握实权，管理一切。如各县县长必定是中国人，但只可坐官不可做事。副职（副县长），伪满初期叫参事官，固定是日本人，所有一切事务全由参事官决定。这是伪满官场中的规律，任何人不能变更。

农安县人刘会同，是吉林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的，当过大学教员多年，民国初年曾当选为吉林省议会的副议长。伪满洲国成立时，刘会同在吉林走投无路，难以谋生，乃前往黑龙江省谋得汤原县县长职位，苟全性命，本可以借地吃饭。但刘会同不知深浅，硬说他当伪县长，有权处理一切事务，可采用参事官的意见，但不受参事官的支配。他到任日子不久，就知道参事官有侵吞公款、横征肥己等不法行为。在查得确证后，将要办理的时候，参事官知道了，立时将刘会同逮捕，当即召集全署日满职员讲话，他说：满洲国人要想管日本人，就是大逆不

道，今县长查我的毛病，就是想要造反；应当处以死刑。说完，便将刘会同枪毙。刘会同身充伪县长就这样死于非命。

汉奸县长习齐辉

展庆喜

习齐辉，字达初，加入日本国籍后，改名羽白太郎。1897年生，原籍江苏省南通人。1948年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省。

该人于1921年从江苏省南通来海伦县经商。其人狡猾、奸诈，善于欺骗和社会交际，于1925年就当上了海伦县“烟酒公卖局”的主任。在任职期间，大肆贪污、勒索，发了横财。1928年当上了海伦县“义合永烧锅”的股东。1929年至1932年先后开设过“义合号当铺”、“大通粮栈”、“余巢粮店”、“大租车柜”等买卖。他不仅是个地地道道的奸商、资本家，而且还是一个风流浪荡公子，乱搞女人，逛妓院，经常出入大烟馆、赌场等。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不惜采取一切卑鄙手段，把本国内的女青年进行特务训练后，通过各种途径派到中国进行特务活动，为其侵略中国打下基础。日本女特务贺川良子，经过日本的特务训练后，于1929年从哈尔滨派到海伦县妓女院，公开的身份是妓女，秘密进行特务活动。1930年习齐辉在逛妓女院时，结识了贺川良子，并经常在一起鬼混。由于贺川良子是海伦县的名妓，又是外国人，当时海伦县城的上层人物，都要争占她。自从习齐辉与贺川良子接触后，便利用手中的财势，贿赂“官相”；排挤他人，最后将贺川良子占为己有。贺川良子

也看中了这个有财势，奸诈、狡猾，社会交际广，活动能力强的人物，并将习齐辉发展为日本特务，不久二人结了婚。从此，习齐辉这个中华民族的败类，干着背叛祖国、出卖人民的勾当，充当着日本侵略者的忠实汉奸走狗。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日本侵略者的小头目平贺司令侵入海伦县城以后，首先找到了女特务贺川良子，并利用贺川良子充当翻译。这样，习齐辉有了谄媚日寇的阶梯。由于习齐辉使尽了各种招数向日寇平贺司令溜须拍马，得到了平贺司令的重用。不久平贺司令就将习齐辉派到青冈县，登上了县长的宝座。来青冈上任之后，把从海伦带来的三十多名亲信分别安插在重要的单位，如警务科、警察署、财务科、地政科、总务科、协和会、兴农合作社等。把原来掌权者，大部分免职或调到其它部门，换上他的人。伪警务科是日本帝国主义镇压、统治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习齐辉到任后，将原警务科长米春轩调走，换上他带来的邢继先担任。王之荣本来是个无能小辈，由于是习齐辉拜把子弟兄，也当上了警务科的警佐，后任警务科特务搜查班的主任、警务科的股长、警察训练所的主任、骑兵队队长、青冈警察署的署长等重要职务。并参与逮捕、审讯我抗日烈士赵祥案件。青冈县的兴华地区是与明水、海伦、望奎三县的结合部。日伪政府认为兴华地区是个重要地方，习齐辉便将他从海伦县带来的于铨璋派到兴华当警察署长。日伪县公署的总务科长张洪儒、财政科长赵忠、行政科的隋子明等人都是习齐辉从海伦带来的亲信。

伪大同元年（1932年）习齐辉来青冈县任汉奸县长。初任不久就被奸商王晓峰用金钱拉拢住。王晓峰为什么迫不及待地拉拢习齐辉呢？原因是这样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王晓峰就开“当铺”。“九·一八”事变的当年，李海青抗日队伍

进驻过青冈县，不久离去。王晓峰见有机可乘，把群众当给“当铺”的贵重物品运到哈尔滨市出卖，将钱私吞，回来后宣扬当铺的东西都被李海青部队的人抢去了。当时住在青冈县城内的刘占一是个主持正义的老知识分子，知道王晓峰玩弄这个鬼把戏的底细，便找王晓峰进行质问，当众揭露了王的这一丑事。王晓峰理亏，只好赔偿了出当人的一部分钱。但王对刘怀恨在心，伺机进行报复。从王晓峰将习齐辉拉拢之后，王多次向习齐辉诬告刘占一有反满抗日行为，又说他是黄枪会头子，并在刘占一家的柴禾垛里安脏，偷着放进三支扎枪头子。习齐辉令警务科派人去刘家搜查，将所谓“凶器”搜查出来，当即将刘占一逮捕。第二天将刘占一等人交给了驻安达的日本军官西可大尉（来青冈视察后回安达），带到青冈、安达两县的交界处林家烧锅屯（现在互助乡的新望村）活埋了。同时被活埋的还有刘占一的父亲刘广文，刘家请来说情的翻译林泽英弟兄（朝鲜族人），去安达买粮的刘老五、车掌包于占元和一个过路人等共7人一起活埋惨死。

伪大同2年（1933年）至康德5年（1938年），习齐辉在任伪县长期间积极效忠日寇，采取各种残忍手段屠杀青冈县的爱国人士，作为他向上爬的资本。日本帝国主义侵入青冈后，凡知国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感到当亡国奴耻辱，对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利用各种办法抵制日伪政府的统治、压迫以及剥削中国人民各种措施的推行。如抓劳工，交出荷粮，农副土特产品的统购，老百姓吃细粮犯法，实行食盐、火柴、布匹、豆油配给制等等，使中国人几乎失去了生存条件。因此，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抵制、反抗，伪县长习齐辉便下毒手进行屠杀。伪大同2年至康德5年，在习齐辉的主持下，先后5次活埋和枪杀我中国人民。1933年夏季，夜间用汽车将二十多

名中国人拉到通肯河边用刺刀捅死，将尸体扔进河内。1933年秋季的夜晚，乘夜深人静，在县城东北角外边的周家坟地等处，活埋中国人三十多名。1934年夏季在青冈县城西门外活埋11人。1937年因兴华一带，有些爱国知识分子对日伪政府极为不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较为活跃，习齐辉为了镇压这个地区的反满抗日的气势，将10名被扣上“反满抗日”罪名的人员，拉到兴华镇东北马家园子后边枪杀了。此事件发生后，前民国的老校长贾润圃向省写信告发习齐辉在青冈县随便杀害中国人的罪行。省里用电话追问此事，习齐辉谎称是监狱炸狱，处理几个犯人而了事。

习齐辉在青冈县任县长期间，作恶多端，群众对其恨之入骨。然而，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却深得日寇的宠爱。日本人在青冈县的参事官松村三次向上司打报告说，现在青冈县的习县长，从事着日本皇军的特殊使命，是一位难得的好县长。这就是对日本走狗习齐辉罪恶的真实记录。

由于习齐辉在青冈任县长期间，出卖祖国、杀害中国人有功，于康德5年（1938年），将其调往我抗日根据地巴彦县当县长。习齐辉在巴彦县任县长期间，参与了杀害我三百多名抗日将领、战士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全东北闻名的“巴木东”事件。之后，又被重用，调去牡丹江市任市长。“八·一五”光复后，习齐辉逃到了辽宁省沈阳市。1948年，沈阳解放，又逃到天津市任国民党政府要员，曾被选为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天津解放逃去上海，由上海逃往台湾。

（摘自《青冈文史资料》）

忆日本侵略者对古镇碱厂的血腥统治

李洪达

日本国内的一股右翼势力，常常借各种机会否认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行径。前一时期国土厅长奥野诚亮等连续谈话，声言日本当时“没有侵略意图”，否认日本侵略中国。他在国内外正义舆论谴责声中被迫下台后，又纠集右翼势力，继续坚持侵略者立场，颠倒是非，否认史实，为日本侵略狡辩。这引起了对当年日本侵略我家乡碱厂的回忆和无比愤慨。

我生于本溪县碱厂满族镇碱厂村。这是个大行政村，属镇的所在地，在明清时期就是我省东部山区一个兵家必争的古镇。碱厂地处本溪东部太子河畔，是个盆地形的小平原，早年是东部山区土特产的集散地和小水旱码头，在未修溪田铁路前，太子河是该村直通本溪、辽阳等地的水路运输通道，旱路四通八达，东至桓仁、通化，西至小市、本溪，南通宽甸、凤城，北接新宾、抚顺，向有“先有碱厂后有本溪”之称。民国时期是本溪县的第二商业重镇。当时全镇达八百多户，九千多人口，其中工商户占二百多户，本溪市的大商号“火悦成”还是碱厂“公悦成”的分号。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由于日伪的野蛮统治，碱厂的工商业日趋萧条，逐渐失去本溪东部山区经济中心的地位。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对古镇碱厂的法西斯统治，是日本侵略中国、野蛮统治和屠杀沦陷区人民的一个缩影。1931年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踏向碱厂。1932年，在碱厂驻防并进行游击活动的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李春润部，由于日本关东军不断向东部山区增派侵略军的军事压力，而撤出碱厂后，古镇碱厂便成了日伪重要战略据点。此后碱厂人民长期在日伪的血腥统治下，过着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

1933年以来，日本侵略者先后在碱厂驻扎的有米冈中佐、片野中佐为首的“守备队”。1934年以后，日本关东军又改派“守备队”大队长喜多中佐进驻碱厂。当时日本侵略军在碱厂少时有二三百人，多时达四五百人。“守备队”的队部设在碱厂的烧锅“福兴魁”大院内，门前设有刺网栅栏和双岗的岗楼，福兴魁大院的四周拉双线铁刺网，四角修四个炮楼。看上去戒备森严，实际上反映了侵略者做贼心虚。当时驻扎的“守备队”除队部设“福兴魁”大院内，“杜秀才大院”等地主大院也为日本“守备队”所盘踞。

日本侵略者除在碱厂驻扎“守备队”，还常派宪兵队和日特“搜查班”配合“守备队”镇压中国人。同时日寇还在碱厂设立了伪警察署、伪村公所，并组织了森林警察队，还把民国时期的商团改编为保甲自卫团。后来由于抗日联军和抗日自卫军等在1934年以后两次攻打碱厂的日伪机关，保甲自卫团的安团长被日伪机关怀疑，视为“剿匪”不力，在1937年左右被日伪缴械解散。此后，设在碱厂“福兴魁”大院的日本“守备队”、宪兵队、“搜查班”和设在“公昌泰”西侧“崔油坊大院”的伪警察署，则成为日伪镇压和屠杀碱厂一带民众的两大魔窟。

当年盘踞在碱厂的日本侵略者为了强化法西斯统治，在古镇碱厂一带频繁去外乡“讨伐”，实行烧光、抢光、杀光政策，大搞“归屯”、修“围子”活动。

日本侵略者每次从碱厂出发去外屯“讨伐”时，见到离

“围子”较远的耕地的农民使用枪射杀，然后割下人头或耳朵带回碱厂交警察署悬挂示众，作为“讨伐的战利品”。碱厂的日本“守备队”回村，总是带回一大筐人头或一两串人耳朵。在秋冬季节，伪警察署的门前影壁下，时常堆着一堆中国同胞的人头，也有时挂着两串人耳朵。我当时在小学读书一次和几名同学路经伪警察署门前，见到影壁下堆着7颗人头，其中两颗头上被枪弹贯穿，一名相貌仅是一个十二三岁儿童的人头。鬼子在碱厂四周修“围子”后，在5个“围子”门旁的树上，时常挂着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用来恫吓当地居民，宣扬日本侵略者的兽威。然而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中国同胞是吓不倒的，鬼子每次去碱厂东部八里甸子、红土甸子、大四平、苇子峪等地“讨伐”时，也常常拉回几具日本侵略者的尸体或骨灰匣。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在碱厂的后山脚下，也埋下了数十具日本侵略者的骨灰。这是中国抗日军民对侵略者的惩罚，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拿日本青年做炮灰，侵略中国神圣领土的铁证。

日本侵略者在碱厂一带“归屯”、修“围子”时，把许多自然屯或沟岔住的居民赶到碱厂等一些大村镇里。一些为了种地活命舍不得离开山村家园的农民，不是房屋被扒、被烧，就是本人或全家被杀。日寇对“归屯”后沟沟岔岔来不及进村的居民，一律烧光、杀光和抢光。仅在伪满康德4年（1937年）10月27日的一天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就把碱厂东部一带的东营坊、洋湖沟、小东沟、红土甸子、小四平、老营沟等小屯子的三百多间民房全部烧掉，大阳屯的农民侯庆东全家12口人，当时被日本人杀死6口。据本溪县有关部门统计，碱厂以东的东营坊等8个小村落，被日本侵略者烧毁民房1238间，有数十居民被杀。日本侵略者在强令中国人“归屯”并户时，还强迫中国的男女老幼居民在大村周围修路、挖“围子”，发现有抗拒不满

的，便拉去砍头示众。我8岁那年便被赶去修路、修“围子”，同去的还有街坊里年近70岁的老奶奶。碱厂村民在日本刺刀逼迫下挖的“围子”全部用铁刺网圈栏。围墙外挖有一丈宽、八尺多深灌水的围沟，每年水淤后便强迫居民清沟、加固“围子”。周围小屯子的居民搬进碱厂“围子”里以后，日本人命令种地时不准离“围子”太远。同时还强迫居民修飞机场、建日本“开拓团”的苗圃，致使碱厂周围大片土地撂荒，使得无数农民年年过“歉年”，靠吃糠咽菜和吃草根、树皮度日。还有很多沿街行乞的乞丐，当时本县流传的歌谣有“挖围子刺线拉，鬼子修路回不了家，山沟房子从头扒，百姓无法收庄稼……”自1932年抗日自卫军李春润部撤离碱厂起到1940年前后，日本侵略者在我家乡碱厂村三天两头屠杀中国人，碱厂的“西北天”（西北山脚）后沟和南城垣子边是日本侵略者砍杀中国人的刑场。当时驻在碱厂的历任守备队长米冈中佐、片野中佐、喜多中佐等和伪警察署日本指导官小田等人，每次去“西北天”杀人时，往往是前面推绑着几个要被砍头的中国人，后面跟着担凉水的伪警察，有时还带去一个长条凳子，备作摆人头拍照用。日本侵略者砍人时，先由宪兵古赖和伪警察刘运卿等人把待杀的人按到坑边上，然后由守备队长喜多、指导官小田或宪兵队长等掌刀，拔出战刀，往水筒里沾一下凉水，再逐个把绑去的中国同胞砍杀，鲜血喷溅，令人发指。在日寇统治下的碱厂居民如坐牢笼，日本侵略者可以随意宰割。碱厂村的一位妇女（农民吴大刚的老伴）因出“围子”去外屯给人看病，被日本指导官小田等抓去，以“通匪”罪名用酷刑折磨后也被拉到“西北天”砍了头。当时日本侵略者拿杀人取乐，在砍杀前，有时先放狼狗啃掉待杀人的脚跟和脚趾，然后才砍头，有时先用小手枪往待杀人的非要害处射几枪再砍下人头。我的同学关喜朋的舅父张

大伯，是个老实憨厚的农民，因进村晚了些，便被鬼子拉去砍头。他就是先被日本狼狗啃掉脚跟，在惨呼叫骂中被砍头的。日本侵略者在砍杀人之后，有时令伪警察拣起人头摆在带去的条凳上，日本守备队长喜多、指导官小田等拄着战刀站在人头后面，令本村唯一的一位照相技师王显忠给拍照。有时日本人在砍杀中国人之后，命令伪警察从尸体上扒出人心带走，听说日寇拿中国人的心下酒。当时被关押在宪兵队、守备队和伪警察署的中国同胞，有时单个地被拉到南城子边扔进日本的狼狗圈，被狼狗活活咬死吃掉，听日本侵略者说这是为了训练狼狗。也有时把在押的中国人不经审问便装进麻袋用棍棒活活打死。这些，就是日本右翼分子奥野之流宣扬的当年日寇在中国领土上所干的“没有侵略意图”的勾当。当年侵占我家乡的日本侵略者不仅以砍杀中国人取乐，也时常对无辜关押的中国人施用各种酷刑，进行惨无人道的污辱取乐。伪警察署的历任日本指导官，都残害过中国同胞。特别是鬼子小田，既是一个砍杀中国人的魔鬼，也是一个用酷刑折磨、凌辱中国人的野兽。当时我家左邻住着一名伪警赵喜三，他有次对小田在警察署用酷刑折磨中国人取乐看不下去，回家对院里邻居崔大伯等人说，小田这些日本人不拿满洲人（当时日本不准东北人称自己的祖国，只准叫满洲国人）当人了，动不动就拉出几个男女“犯人”取乐。先是把他们的衣裤扒掉，通令在他面前“扭秧歌”，学狗爬，不从就是一顿毒打，然后用烟头烧乳房和小便。今天又拉出两名从屯下抓来的老头和妇女，一是公爹，一是儿媳，小田令人把他们的衣服扒光后，强令父女搂抱，因这父女俩反抗，被用烟头烧过后，又毒打昏死过去，简直是个野兽！当时在日本宪兵队、守备队和警察署两个魔鬼的日本人及其爪牙，每天对抓去的中国人施用压杠子、上大挂、灌辣椒水、灌火油、猪尿，用

火钩火铲灼等种种酷刑进行折磨取乐。魔窟附近的居民不时听到中国同胞的惨叫声。在这两个魔窟的门前，中国妇女不敢通过，遇有妇女从门前经过，小田等日本人便喝令狼狗扑上去撕咬，然后他们在中国妇女跌爬奔跑和惨叫声中鼓掌狂笑。这些也是奥野之流宣扬的“不是侵略”的“日满亲善”的活动吗？

当年，日本侵略者为推行其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利用其爪牙汉奸残害中国同胞也是令人发指的。1937年左右日伪给碱厂伪警察署派来一名署长名叫阮子忱，他原是一个伪自卫团长，因协助日寇屠杀抗日军民“有功”当了署长。有次日本侵略者推出19名中国同胞去“西北天”后沟砍头，他为了凑够20人，又从看守所提出一人凑数。1939年左右，日特“搜查班”的贾翻译，外名叫“贾大鼻子”，三天两头在碱厂“圈子”里抓人打人，被他抓去送到日本人手里，多数被杀头或喂狼狗。有一次他借口家父李文奇在村里办过女校，“有反满抗日嫌疑”，诬指家父藏有手枪，在当院毒打后进行敲诈，声言“限三天交出手枪”，否则送交日本宪兵队。后经本村商人杨茂亭等从中说情周旋，勒索去六两大烟土和一些伪币才算买了活命。此后家父吓得患了半年多病。有一次贾翻译看一名老农背的烧柴质量好，扯过来打得鼻口喷血，然后把烧柴没收。还骂不绝口地说，你这个老家伙象个土匪“拉线的”。今天大爷开恩，饶你不死！当年碱厂日伪其他一些爪牙，在逼村民修路、修“圈子”、修飞机场，给日本开拓团苗圃干活时的打骂虐待，也是“家常便饭”。总之，当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家乡古镇碱厂的血腥统治，使家乡人民和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中国同胞一样，过了14年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

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过去，丧失警惕的。决不让那些为日寇罪行狡辩，为侵

略者招魂的日本右翼分子奥野诚亮之流，再做“大东亚共荣圈”美梦！

（摘自《本溪文史资料》第四辑）

伪满北镇街村制沿革

何宗林

伪满洲国时，笔者在曹屯乡大柞村公所做事多年，对北镇县街村建制有关情况的回忆，写在下面：

北镇县街村制沿革

“九·一八”以前旧中国时期，没有街村建制，只是各屯有一名屯长和两名管理地方摊派款项的人员，也不是专职人员。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不久，开始建立街村机构。全县共有108个街村。村公所有村长1人，助理员1人办理公文，差役2人（土名“跑会的”）。这时的村务不多，在人们眼中还没被重视，只是摊派点花销而已。

1934年底，开始并村，村公所机构扩大了，合并为78村。除村长助理员外，增添事务员、雇员五六名，村丁三四人。村税增加了，开始编十家连坐制，有十家头百家长（村董），掌管整理户口、编壮丁、修道路等，村公所象个地方行政机关了。村设警察分所，置分所长1人、警士2人，负责治安，禁止赌博，夜间巡逻查哨等。接着村公所增派棉麻指导员，开始派种棉麻、黄烟，配给肥料、药品等。

1938年为了强化街村的统治机构，又合并街村，变成32个

街村。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日本把东北看成是援战物资基地。街村就是征集人力、物力的执行机关。开始实行国势调查，即查清人口及资源状况。接着实行征兵制，村公所设国兵民籍系，负责调查壮丁，为征兵做好准备工作。设产业系，负责军用物资的摊派，各种农作物面积的分配；保证种植棉、麻、烟草、大豆的面积，以后还种过除虫菊，总之种植要满足军事的需要。又设劳务系，专门要劳工，提供阜新煤矿和兴安北省、三江省（两省即现在的内蒙古呼盟和黑龙江省东部）修筑战备工事的劳力。

1940年后，为扩大街村统治机构的权力和精简机构集中统治的力量，又将街村合并为20个。村公所共设4个系，即总务系、财务系、产业系、国兵民籍系，大的街村还设劳务系（一般的附属在国兵民籍系）。财务系主管征收国县税及村屯事务附加税；产业系负责完成农牧产品物资的摊派征集，监督追种任务；国兵民籍系负责人口调查出生死亡登记、国兵及壮丁的调查、劳力资源的统计；总务系管村屯人事训练，公文收发等不属于别的系管辖的杂务。当时的20街村为：北镇街、沟帮子街、阎阳村、肖家村、鲍家村、闵家村、烧锅村、大市村、正安村、中安村、窟窿台村、青堆子村、五粮村、赵屯村、车堡子村、广宁站村、张代村、汪家村、边家村、大祖村。

1945年，战争进入更加紧张阶段，为强化街村集中统治权力，又将20街村合并成12个街村，即北镇街、沟帮子街、阎阳村、大祖村、鲍家村、闵家村、石佛村、四方台村、正安村、中安村、五粮村、赵屯村。村公所内部各系照旧。

大祖村农民负担概况

大祖村是伪满街村建制开始执行时的老村。108街村时，只

辖大祖屯及南北河西两小屯。78 街村时，将曹屯村的 3 个自然屯并入。32 街村时，又将徐屯村 6 个自然屯并入。20 街村时，又并进罗屯、廖屯等村屯。到 1945 年最后一次并村时，共辖 12 个区划，计有 40 个自然屯。土地有 7 000 天地（“天地”为当时北镇民间使用的土地计算单位，每“天地”约产粮食 400 斤），人口约 15 000 口人。成劳动力约 3 500 人。

“出荷”粮谷按土地面积平均每天地约 400 斤，全村约出荷 200 万斤（5 000 天地）。10 天地以上农户迫种半楼黄烟，20 天地以上户迫种一个楼子的黄烟。中小户迫种棉麻，秋后全部送缴棉花株式会社。达不到任务的，迫交被套。农民秋天交出荷粮、棉时，是一年一度的难关。有很多农民去了交出荷的，就没有吃的，为了保住点吃的，就得豁出去受些折磨。因完不成出荷任务，被警察、村公所职员、县里派出人员，找到区划所罚跪、举称杆、跪砖头等，受尽软硬刑罚。有的农民为私留下点棉花，以备纺线织布，就得将被套褥套交出，一看是真没有棉花了，才算罢休。实在没招了，也有全家逃走的。

农民另一个沉重负担就是摊劳工。大户有钱雇人顶替，有势力的，可以找个自由差使当当，或者在某机关哪怕是在事务所当个挂名雇员，也可以不摊劳工。小户人家虽有劳力，但全家指望这个劳力养家口，摊上劳工是最难的了，雇还雇不起，去还去不起，没法子只好自己去，全家生活就更难了。逃跑也消停不了，因为劳工是一批接一批，这次躲了，下次还得摊上。一个劳力平均两年就得摊上一次。与县里劳务股、村上管劳务的职员、区划长或警察有关系的户，虽点上劳工，但是花几个钱、送点礼请请客也可以躲过去。有的人自己去，到场一检查说有病，骂一顿，或责备村屯人员一顿，说把有病的整来干啥？滚回去！也算完事。每次要劳工都是层层加码，县下到村加一成，

村下到区划也加一成，区划长点劳工也得多加几个，这样因层层加码，他们各级管劳务的就有了受贿的机会了。全村一年约出劳工1千名。

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紧张，征集的物资越来越多，席苳、麻袋、猪皮、狗皮、羊毛、废铁、鸡蛋。他们凡是征集的东西，也都事先摸了底。1940年后的副县长是日本人，叫新川吹雄。他有几个亲信村长，就是大祖村长胡显达、鲍家村长陈秩新、赵屯村长吴正言、广宁站村长李连亭。凡有机要大事，新川吹雄就到大祖村胡村长的家里来，夜间招来几名村长，研究情况。定盘后回县，开各村长会，布署任务。警察、“协和会”、村屯总动员，有时完成八九成，实际就已超额了。任务下来后协和会先出面说为了“共存共荣”，人民得出力。实在完不成（实际超额任务了），协和会装好人向上说话，请免了其余的数。让群众还得说协和会好。总之，北镇县的日本统治者善于耍手腕，使你出足了血，还不致于要了你的命。如出荷粮要的是不少，但也不至于使你饿死；劳工是要不少，但剩余的还能种上地，这就是要长期奴役你。如同人使役牲口似的，为使你继续出力，就得留你的命。

农村无人敢惹的区划长

区划所是街村制下边的基层单位。所有街村行政事务，都由区划所来实行。区划长是最有实权的人物，可以说是一个区划的“太上皇”。

日本侵略中国是分步实现的，先东北，后华北，然后深入西南向全国。东北成为它的侵略基地。东北人民已成了亡国奴，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供应地。人口都受奴役，谁当区划长都不能避开派出荷粮、派劳工、派征集物资等任务。因

此要劳工要出荷，不能怨区划长。那么为什么都恨区划长呢？他招人恨，是有另一面的情由。区划长没有违抗出荷、劳工的权力，但他有叫谁多出少出的权力。上边派10万斤出荷粮任务，他具体一分加二成，他的亲友、亲信、“靠山”、地方有势者，在他掩护下可以不出荷或少出荷；上边要10名劳工，他点了12名，上述人可以虚晃一招，过后没事。这样在一个屯子里，有哭的、有笑的，苦乐不均。他们这帮子人不负担，就加重了别人的负担，正因为有这样权力，区划长就成了区划中的铁腕人物，谁也不敢得罪他。得罪了区划长，迟早叫你吃亏受气，使你知道他的厉害。一般是暗使警察整治你，说你违抗服役或家有私货，在日本统治时期，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成是违法的。

大祖村小祖区划长×××是落魄的地主家庭出身，当过几天买卖人，给粮栈当过粮把子，能说会道，私官两厢善于圆滑，在屯中大家公认在这个世道，非他谁也应付不了这个局面。因此，公选他担任区划长。家家把区划长看成是屯中的唯一靠山。谁家私自弹点棉花被警察查出来了，就得苦苦哀求区划长。果然他一出面说说了事，对他千恩万谢，年节请吃顿饭，或赶上办喜事时，重重送点礼。谁摊上劳工跑了或者去劳工未满期跑回来了，警察保甲时常来抓找，也必须托区划长给疏通才能了事。1943年交出出荷粮时受他庇护的大户未交，任务差的太多。他与村上谋划出“报恩”一词，使土头土脑的中下等农户在完成任务外，再加二成报恩粮。有一家姓毕的知道底细，揭了他的底，他哑口无言，取消了他的报恩粮。但时过不久，分所长“于小胡子”来屯督催出车修县道，他跟珠一转就说：“毕家的车要不动，影响修道。”于小胡子立即找毕某打了一顿，还得他出面给讲情了事，好坏人都是他。所以人们对这位区划长敢怒而不敢言。谁要触犯了他，谁去劳工管保快，这种小鞋准穿上

了。这位区划长对上级善于逢迎，成为大祖村长胡显达的四大得力区划长之一（其余三个是金屯的、廖屯的、罗屯的）。这位区划长在本区划也笼络了一批有势的地主作为他的靠山，如潘××，连户牌长毕××等支持他，使他得以连选连任到底。

这位区划长变相贪污很巧妙。一年四季县村级人员、警察分所人员来区划时，都是在他家设宴招待，不但家人及帮忙的跟着吃喝，连他家的伙计也都沾了光，吃得嘴巴溜油。招待费是“白条”帐，说多少是多少，按地均摊。屯中人背地叫他：“白尾巴狐狸”。每年配给迫种烟棉土地肥料，谁也不知多少，分下去一点儿，走走过场，大批肥料被他私吞。

（摘自《北镇县文史资料》第八辑）

伪满时的保甲制、街村制

黄显升口述

文建章 潘殿刚整理

1937年4月我到洮安县（1938年5月1日改称白城县）苇子房保公所任事务员，第二年又考入白城子街公所任司计，1941年到平台村公所任助理员，后又到大兴村公所和格索营子村公所任村长，直到1945年8月祖国东北光复。

推行保甲法，强化殖民统治

伪满时的大同年间（1932年和1933年），洮安县的基层政权仍沿袭旧制，县内设警察局，下有8个警察区，每个区都设警察署，县里还有警察大队，负责“清乡”、“剿匪”，维护地方治安。各警察区虽有自卫团，但受彭金山的自卫团统带部管辖、指

挥，警察局管辖不着。一个警察区内有两三个村，全县不是29个村就是30个村，都是小村，村有村长，一村管辖3至5个屯。

1932年8月29日洮辽警备军第九团（白团）与八区部分自卫团举行武装起义后，日伪当局趁彭金山调到郑家屯任职，首先废除了自卫团统带部，将各区自卫团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县长（实际上交给了县公署的日本参事官），并对各区的自卫团进行了清洗和整顿。

1933年12月22日伪满政府公布了暂行保甲法，1933年1月17日公布了“暂行保甲法施行规则”，同年12月22日又公布了保甲法。洮安县于1934年（康德元年）实行保甲制，将全县城乡划为21保，保下划甲，甲下划牌，城内一牌有50户，农村大屯划两三个牌，小屯一个牌，还有两个小屯划为一个牌的，户数在四五十户之间。保设保公所，有保长、会计、事务员等，甲有甲长，牌设牌长。每个保内都设自卫团，自卫团有团长，也叫保董，下有三十到四十多名自卫团员，武器都是县里发下来的，是一些过去从乡间收缴上来的私人杂牌枪。有的一个保（单保）建一自卫团。有的两三个保（联合保）建一自卫团。当时社会秩序很乱，为防范“土匪”，维护日伪统治，自卫团员都吃住在团部，昼夜值班，并有电话和县里相通，随时汇报“匪情”，听从县里（主要是警务局）的调遣。实行保甲，是“十家连坐”下来的，一人通匪，全家受罚，一户通“匪”，邻居受株连，一保内出了“匪”，将要制裁保长。建立保甲就是互保不通“匪”，不资“匪”，防范“坏人”进保甲防区。

在第1警察署（白城子区）设了5个保，在城外设了3个保，即三合屯保，保盛屯保（保长陈德生，土改时被镇压），太平庄保；城内设两个保，以现明仁街为界，划分东保和西保。东保长韩成林，保公所设在现五金一商店大楼处，西保长王晓峰，保

公所设在现水果店大楼处，两个保一个在道南，一个在路北。乡间19个保都有自卫团武装，城内东西保与外乡的保建制一样，就是没有武装。在第2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大兴屯保，保长刘万仁；苇子房保，保长高永吉。第3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哈尔呼吉保，保长徐士武（后任花拉道村村长，土改被镇压了）；花拉道保，保长的名字忘了。第4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程四家子保，保长姓聂；十家子保，保长姓季。第5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30户保和满洲岱保。第6警察署区内设3个保，有西五家户保，保长是小龙湾屯的孙绍华，孙后来到大兴村任过村长；有胡宝山保，保长黄云卿；还有高世功保，保长郑相庭。第6警察署区内的3个保是联合办公，联合保公所办事处就设在胡宝山屯，3个保长轮流到保公所办公。第7警察署区内设3个保，有五棵树保，白庙子保，素格营子保。第8警察署区内设2个保，有苗家窝堡保，红八塔保。

我在1937年4月在苇子房保公所任事务员，保长是保公所西高大骡子屯的高永吉（高兴阶），他经常在保里吃住，那时保上的事情多，胡子也多，县经常来电话，他不在保里不行。保公所驻有自卫团，团长也叫保董，姓马，他归警务局管，但也听保长的指挥。我和保公所的会计薪水都是三十元左右，保长和保董挣的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职务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当。枪是民国时散在人民手中的枪，啥枪都有，很不统一。自卫团员都是当地人，每人每月20元左右，还有“马乾”（读gān，马的草料费用），每天5角钱，一个月可有三十多元的收入。

苇子房在大沁塔拉草原的边上，过去那地方常闹胡子（土匪），于八店那地方就是胡子窝，像兰家圈子屯和勿兰巴打南屯，都有“活人”，谁家被胡子绑了票非找他们去通融不可。但胡子对大户人家也不敢怎样，因为大户有枪有炮台，一时打不下这

个“窑”（指院落），还容易遭到警察大队和自卫团的增援和袭击。一般他们抢的都是些中等农户人家，抢完就走，不在一地停留更多时间。我在苇子房保公所只呆4个月，有胡子路过，但还没有发生大帮胡子攻窑抢劫的事。

1937年8月，我到胡宝山保办事处，是总务兼会计。这个办事处是3个保（胡宝山保、高世功保和西五家户保）的联合办事处，地点就在胡宝山屯。后来我才知道黄云卿在白城子也是很有名望的人。他和李方（其父李云起是放荒“挽头”，30户大地主）是亲戚，和杨春甲也是亲戚，杨父杨润波是民国时的省议员，是黄云卿的表兄弟。民国时奉天省有省议会，一个县一个省议员，可见杨润波在洮安县里的名望地位是不一般的，杨春甲也是大地主。黄云卿有这样两家靠山，所以才能当起保长来。我到白城子来，就是高永吉和黄云卿举荐我，我才来的。这个联合保的办事处3个保长轮流住在保里。这3个保就一个自卫团，保董姓郑，下面有二三十人。这3个保内很太平，那里一马平川，又是洮安县（白城子）的中心，没有闹过几回胡匪。

伪满康德4年收缴枪支，自卫团随着也撤掉了，加强了警察力量，以后警察也多了。日伪政府为了巩固保甲制的实施，各警察区也设立了相应的警察分所；白城子警察署设立了三合屯、保盛屯和太平庄警察分所；苇子房警察署设立了大兴屯分所；哈尔滨警察署设立了花拉道分所；十家子警察署设立了满洲岱分所；胡宝山警察署设立了西五家户和高世功分所；白庙子警察署设立了五棵树和索格营子警察分所；苗家窝堡警察署设立了红八塔警察分所。

全县一共有多少甲我不清楚，象我呆过的苇子房保就有5个甲，即苇子房（修好屯）、王豆腐房、金钱达、平顶庙和勿兰巴打。胡宝山有陈树政、方家、龙湾、胡宝山、陶家屯5个甲。

西五家户保有4个甲，即西五家户、东五家户、凤凰城和聚宝山4个甲。高世功保有4个甲，即日升屯、田喜屯、刚喇嘛屯、高世功屯。至于每个保都各划多少牌，我更不清楚了，因为保就管到甲，一切都与甲联系。

保直接归县里管，保公所的呈文直接送到县长，上写“××保××号保长×××”中间写“洮安县长殿”，不与区（指警察区）发生关系，县里文件也一直到保。保里关于其他事项报告则报告有关科局，如关于人口的事报行政科，关于耕作方面的报实业科，关于征兵的事报动员股（国兵民籍股），如此等等。

全面推行法西斯政治，实行街村制

在白城子实施街村制是从伪康德5年（1938年）5月1日开始的。根据街村制“规则”，废除了保甲制，把原来的保并为街和村。同时洮安县也改为白城县。白城子街内原来的东西两保撤销，建立白城子街公所，街长韩成林。将白城子街外原来的太平庄、三合屯、保盛屯3个保合并为太平庄村，村公所的地点就在保盛屯，村长先是高村长，后来是门玉璞。将苇子房保和大兴屯保合并为大兴村，村长徐世武。将哈尔呼吉、花拉道保两个保合并为哈尔呼吉村，村长范仲庚（先是徐世武，范原是助理员）。将程四家子、十家子两个保合并为十家子村，村长郑长仁。将三十户保、满洲岱保合并为三十户村，村长黄云卿。将西五家户、胡宝山、高世功3个保合并为胡宝山村，村长杜水书。将五棵树、白庙子、索格营子3个保合并为白庙子村，村长高永吉。将苗家窝堡、红八塔两个保合并为红八塔村，村长孙连才。全县共划1个街和8个村，随着保公所撤销之后，原来的甲也就改为屯了。康德6年又增设三合屯和索格营子村公所。索格营子村长李瑞（号雪峰，原满洲岱教员），三合屯村公所村长冯绍箴

(后门玉璞)。

伪康德8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为适应其日趋紧张的局势,便于支持平台军工基地的建设,便于督促出荷和经济统制,又将胡宝山村的东五家户、西五家户、凤凰城、聚宝山及红八塔村的四马架、张俭屯、三岔堂等十来个屯设立了平台村,村公所设在平台,村长门玉璞,后来是刘景兴。由于哈尔滨吉村公所管辖地面太大,如六家子都近镇东了,就在楚伦坡东,即洮儿河堤东头增设了花拉道保村公所,伪满白城县农村的12个村公所建制直到1945年8月东北光复。

我是在胡宝山保通过考试进入街公所的。1938年5月1日成立白城子街公所,我是5月2日到街公所的。街公所有几个系,行政系有王书润、董士庸,财务系贺移坤,国兵民籍系的孙家象等人。当时街长是韩成林,是当地土坤。他的老叔早年曾任税捐局长,他的姑母是万福麟的大太太,万国宾则是他的表兄弟了。韩成林当街长可能也借万福麟的光,当时万福麟正在关内与日本军队作战,安排他当街长可能也是作为对万福麟等人的一种引诱吧。韩成林当街长时间不长,到伪康德7年就给他给免职了。因伪康德6年3月24日公布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法律开始实行,日本在白城子领事馆(现五金楼地址)撤销,日本居民完全由街公所管理。当时县城人口25 000多人(25 107人)中,日本人就有2 000多人(2 057人)。伪康德7年以后“出荷粮”日紧,配给物品增多,人心不稳,街公所也派进了日本人任职,韩总和日本人顶牛,就遭免职了。韩离职后,没有街长,则由日本人岛村副县长兼街长一职,副街长由栖本、遇那岭两个日本人担任。伪康德7年又派来安永宽任街长一职,安只呆了3个多月,也因没处理好同日本人的关系被调离。之后就派来日本人安武展喜任街长一职,副街长先后由张玉麟、王

盛贵（王尊庭，原县公署行政科长）担任，直到1945年8月光复。

我乍到街公所的时候，白城子街内仍是两个保，保下面是甲，大体上是一条街的方块为两个甲，甲下为牌，每牌50户左右，光复后才将牌变成间。1938年年底，白城子街内才撤销了保，划了10个区，区有事务所，虽然不是一级政府，但有区长、副区长和事务员等，百姓有事就到区里去办。特别是康德7年实行配给制后，区里的事就更麻烦了。配给的东西太多，是凡日常的东西，如棉布、胶鞋、白糖（粮食用户口簿）等都配给。先是发票，后来发现票易作弊，有票买不到，就用配给簿了。簿里面有项目，棉布一年一次，胶鞋一年几回，糖也每季给一定的数量。各商店也有簿，也限制。各部门买统制的东西要请求，要批条子，如大米、白面都得批条子，布也统制。各家都有配给簿，都得到区上办理。街里服役、出劳工，日本人要修什么，从街上要勤劳奉仕，街上组织义勇奉公队等，都通过区，所以区里事情繁杂，工作很忙乱，几个人也干不过来，往往要找帮手。白城子街10个区的区划是：车站以东沙坑从南到北那一长条地带是10区；铁路居宅是9区；西门外是5区；1区是现市公安局北到铁路；2区在现联营商场大楼以北；3区在现百货大楼以北；4区在百货八女商店北；6区在浴池大楼以南；7区在地区医院大楼以南；8区在福仙居大楼（原明仁文化馆）以南。城乡有街、村公所，县、省有公署，伪中央有国务院、人称“四大政府”，伪满统治机构这才定型。

村公所有村长、助理员（相当副村长）、司计（会计）。村长负责全村工作，助理员辅助村长，司计主管全村的财务和村公所机关的一切收支。下设5个系，有庶务系，负责人事、掌印、文件印发、总务以及礼仪（祭孔孟、祭关岳）等工作。行政

系，负责修缮道路、河川、桥梁，人口、卫生等工作。财务系，具体负责理财、征收，征房地产税、勤劳所得税、附加费、卫生费及税金，收滞纳金，或豁免税金等；那时户口是双重管理的，街公所管户口，警察分所也管户口，也都查户口，但目的不一样。街公所管是掌握人口数，控制统制物品发放，青壮年服劳役，出国兵；而警察分所是控制外来人，和各种罪犯流入。至于卫生完全由分所管，街公所只是配合。征收附加费是街里花销，摊在各种税项上面的钱，加的虽少，街公所每年也能收上3万5万的，收上之后，归街公所自用；各村在收税时也加附加费，归村公所用。实业系，管工商业情况统计、土地播种面积统计。伪康德7年后还负责粮谷出荷、统制物品配给等，对土地耕作面积及时填写上报“割当”（日语，既有情况数）表，后连种大麻子、养牛、羊、马、鸡等都得报数，都得分配任务。国兵民籍系，负责征兵、服役、劳工等。各系都有系长1人，事务员、雇员四五人，夫役（勤杂工）1人。一个村公所都有20余人。属实业系、国兵民籍系最忙，所以人也多。村公所是合署办公，助理员、司计和各系长都是官，但助理员和司计是县里任命的，并对各系实行监督。各屯有屯长1人，每月5元“手当”（跑腿）钱，还有事务员1人，每月30至40元，相当村职员，是村长任用的；下面牌有牌长，没有钱。

街公所的机构除街长外，其它与村公所机构相同。在伪康德8年白城子升为指定街，提格了，各系都成股了。到了伪康德9年街公所的各股就变为课了。课长下有事务员，还有若干雇员。课下不分什么，但有某项工作的担当者，各村也就变系为股了。以前的普通街和各村一样归县管，划为指定街后，就直归省管了，并成立筹备处，做进一步变市的准备。当时的街长就是日人安武晨喜，他来我就调到平台村公所去了。

白城变市在民国时就筹备过。兴安屯垦军民国17年来白城子，要把白城子变为兴安市，所以邹作华督办出了很大力，修建了八大处，划定了街基，动员修门市盖房屋，现在的主要街道就是那时候规划的。当时买街基都得自出现金，但为了壮市面，修街基、盖房子，可以向银行借钱。当时白城子买卖少，富户不多，是个后开辟的地方，人们没有钱，修房子都是向银行借款的。如彭金山、韩成林等各家修不少房子，都是从兴大银号借的钱，是现大洋，各家都借出多少我不知道。我来自城子几次，看白城子修建的确快，只两三年的时间，房子全起来了。那时的白城子街内啥买卖家都有，如精忠书馆、大烟馆、饭馆等也纷纷建立起来了，市面很是热闹。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而没有变成市。兴大银号是国家的钱，后来政局变了，彭金山他们借光了，都白捞一笔大钱。日本来后，也就没人提这些事了。

伪满康德5年或康德6年，日伪当局曾计划向白城县迁移日本居民100万，把白城子街向西扩展到三十户，向西北至平台、平安镇直到镇西（当时叫索格营子），要建成为一个大市，拟建纺织以轻工业为主，并有水产加工、罐头食品、淀粉加工等，同时也计划修建一些钢铁厂等重工工业。各工厂、商业区、居民区的布置，都制成图，存于县都邑建设局内。由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忙于战争，无暇顾及，这项计划也就随着破产了。关于城市建设原来县公署行政科内有一管绘图姓邢的雇员，谁家盖房子都得找他批，并经他绘图。后来由行政科分出一个都邑计划局，局里有一日本人姓岛内，专管绘图。康德5年我调到街公所，大兴城市建设，岛内经常找我，说“黄商（“商”日语“先生”的意思）你的帮我改图，改一个图3角钱。”当时我负担不重，就帮助他修改，对图上的街道、胡同地名不

符或位置不对的地方进行校正。我工作细心，很得他的赏识，于是他就拿出一个大的规划建设图来，让我校正。这就是白城子移民百万的规划图。由于白城子变市、移民百万牵涉许多村屯地名，所以，我才知道这项计划大致的内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都邑建设局就撤了，成了县公署建设科一个股，也就没有财力去搞建设了。就剩下日本这移民计划图了。

白城子街公所下属有一个窑厂，还有一个卫生场。窑厂在伪满初年就有，地点在城北三四里地万家屯后边的德善屯，有好几垧地，主要是烧砖。卫生场在城西乱葬岗子西，有一百多人，负责清除城内厕所粪便和清扫大街。选卫生场地点，日本人曾跑了大连、海城、辽阳、长春、四平等地方学经验，最后选在了那里。那时没有汽车，往城外拉粪有40至50辆马车。城内修不少公共厕所，修的不怎么好，但很干净。雇有监督员，一天清扫几次，兼收卫生费，每户一月三四角钱。就这样北门外日本住户还常常给街公所打电话，说厕所埋汰了，粪便沾脚了，就得叫人去清理，弄得天天不得消停。五金商店大楼地址原是日本领事馆，领事馆撤销后，改兵士乃家，后又改军人会馆。现市工会地址伪满时是日本武术馆（柔道），康德4年街公所搬迁到那里，武术馆和军人会馆都迁到现劳动公园处，其路东又修了神社（后立石牌坊），北门外路东西盖了许多房屋，全是日本居民的住宅（光复后全扒光了），成了日本人的居住区。因卫生场赔钱，后来就包给白雨希了。白雨希民国时曾在黑龙江省某师当过副官长，伪满住在白城子。他和郑濂桥关系好，由郑提议并用郑的恒丰厚粮栈担保，把卫生场包了去，由此发了财，白郑两家还成了儿女亲家。在城西乱坟岗子那还修一个火葬场，火化用的是汽油和柴油，人们都称为“炼人炉”。日本人大人小孩死了都火葬，交火葬使用费，之后将骨灰装在木盒里保存。中

国人也有火葬的，但为数甚少。

伪满康德2年白城子就有大烟馆，康德3年最兴旺，有5个大烟馆，有俊兴隆、赛桃园、宝丰久、兴隆号、新兴号等。这些烟馆都归县里管，街公所不管。我在街公所一共4年，后期升为司计，兼总务系长，又兼庶务系长。那时是人财主义，我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什么靠山，完全是自己干出来的。我刚到街公所工薪是35元，一年内连提3级，长到50元钱，那一年我还买1张1元的彩票，中了5彩，得了50元钱，确实很妥当。但街公所内工作也不是好做的。除两个日本人副街长外，街公所内还有几个日本人和朝鲜人任职。如实业系（管配给）的清水、三浦、大久保，还有一个朝鲜人李某，财务的佐佐木（女），他们与副街长一起掌握着实权，特别是楢本副街长他精通会计，直接管理财务，对窑场、卫生场和火葬场的“三场”财经收支，都直接过问、查看，稍有疏漏，便遭训斥。

伪满时各街村的会计独立，司计负责财务工作，上级审计局经常来检查下面支出情况。来时事先不通知，一来就是一大帮，有二三十人。到街、村公所后，屋内的人不许再干什么，都得站起来接受检查。他们对各股挨个检查，特别是对会计帐目和金库检查的更严。每笔大的支出和收入都检查单据，每份支出单据上都印有现成的报销表格，附在单据的前面，村长、助理员、司计、系长和担当者（经手人）都得盖章。每日金库内存款都有记录，10元的多少，1元的几张，甚至几角、几分都得填好数目。在审计检查时，差几分几角还可以，如差多了就不行，就算失职，犯错误，就要受处分。所以做现金的，每日午后下班前必须下好白天经手的各笔帐，并清点库存现金，作好记录，以备检查。街公所管财务支出有三四个人，而村公所只司计一人，各屯有记帐员（事务员）一人。司计每年末除了

作当年决算之外，还要做好下年的预算支出。会计科目大的方面有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预算超越支出（追加）。

街公所每年开支预算要十几万元，共中卫生场就要花掉四五万元（去掉收入）。当时俸佣工资有分别，街长、副街长、司计以上是官叫俸给，事务员叫工薪或薪水，雇员是薪金，佣人是工资。办公费的项目还有祭祀费，每年要祭关（羽）岳（飞）、祭孔（丘）孟（轲），还有其他费用。街公所的日本人经常过问帐目，我当会计，特别是接近年终，他们就问我还剩多少钱。当时每年年终结余，不论多少，都得作表上缴。他们听说还有多少结余，就填条子，如下乡旅费等项目报销，使一年预算没有结余，之后几个人平分（也塞给我一份）。

伪满康德8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街公所动员股的事务就多起来了。以前街公所主要应付日本军队经常调动，来一拨军队，就要一次劳工，主要是修整大青山的飞机场和从铁路上运输东西。当时汽车没几台，全是大车，当时叫服（劳）役。要人要车全向买卖家要，买卖家出不了人，就雇街内的闲散劳力。服役的人，日本军队虽然给点钱，但很少，除去吃饭，所剩无几。至于出“勤劳俸仕”、义勇奉公，这事归行政股管，则不给什么钱了。去劳工多数是修大青山的飞机场，这个飞机场不如平台北大岗上的飞机场大。平台是伪满一个大型的飞机场。大青山飞机场修时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基础不好、简单、不规格，为适应飞机起落需要，每年都要整修几次。此外，每年到外地出劳工还要两三次，地点不固定。

白城子街那时只有4 600多户，人口25 000多人（1939年统计4 610户，25 107人），日本人就占600多户（675户），2 000多人（2 057人），占城内户数的15%，人口的8%。他们不出劳工，也不出钱，所以当时城内买卖家负担是很重的。伪满康德

6年三合屯建村时即成“自然村”（即“模范村”，每县一个），外来人参观都去那里。三合村虽然地势高，在三合屯中有个高架子，是地高的标志，据测量比洮南高出几十丈，但土壤肥沃，农作物连年丰收。建为“自然村”，县里专门为他们培养作物种子，进行种子改良，县里对他们优待，农民道场还派一名技术员进行指导。当时每县都有一个“自然村”。那年日本还在三合村排过电影，片名叫《满洲大地》，当然拍的是电影的一部分。在那里主要记录了农舍、牛羊群、高粱、苞米、谷子等农作物，还录了农民劳动场面，手摇“乌槽把”（提井水的工具）的情景，在放映时，还组织伪职员和居民们去看，以显示日本侵略者所鼓吹的“王道乐土”。

伪康德8年4月魏绍书任街公所司计，我就到平台村任助理员（副村长）了。平台原来没有村的建制，是因为大岗军队逐渐增多，胡宝山村公所应付不过来而建立的。在平台村公所我只呆了8个月，于同年底（11月）我就调到大兴村公所任村长。

原大兴村村长是孙绍华（五家户保保长）。大兴村地主多，读大书的多，“邪神”也多。敌伪时期当村长一要体察民情，二是为当地农民（中小耕地户）解决些问题。孙绍华在那以“官相”压人，所以当地“邪神”就找机会告他，直到把他告走。大兴村管辖地面很大，下辖13个屯，83个小屯。白城子南部的土地好，民富粮丰。虽然哈尔呼吉、十家子靠河一带涝，但年年都有好收成。伪满以后靠河这一带因连年水涝都已荒芜，日寇借口“开发”把这些土地连同镇东县的一些靠河土地，全都变成了日本殖民的开拓地。镇东县给占去多少我不详细，白城县就给占去17 000垧，大兴村南部和东部土地全给占了去，整个草原为开拓团所有。那时白城县是12个村，136个屯。伪满各

村长都兼协和分会长，白城县南边4个村即大兴、十家子、哈尔滨吉、花拉道保算一个片，这4个村每年开一次协和分会会长联席会议，并选我当会议主席，连续3年，所以那边我去过不少地方。镇东县风水山那有日本开拓团，白城县所占去的大片土地都没有日本人，土地任凭荒芜，人们也不敢去种。就是有个别农户偷着种点小地块，夏秋日本人到各村调查，被查出来也得交“小作料”。

伪满康德8年正是“出荷粮”紧张的时候。过去农民虽负担“军粮”，但摊派的很少，还按市场牌价给点钱。那时的粮食也贱，一斤也就是几分钱。自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之后，“出荷粮”的数额也增大了。起初，县里给一个“割当数”（据播种面积），秋后按“割当数”“出荷”，交完“出荷粮”后都给一些钱和布。伪康德8年的“出荷粮”数是根据各村年初报的数要粮。康德8年正是涝年，而要的“出荷粮”却比往年高出很多。如大兴村2垧地，要“出荷粮”50 000吨，各村完不成，县里就派督励员去督促。督促不上来，就派县公署、协和会等组成“督励班”下去催逼，对人们施加毒打，翻找粮食，搞得很凶。我刚到大兴村，去的是县公署财务科长张太行、股长田光玺（外号田老美）、薛奎武（国兵民籍股长）、杨瑞峰（日本翻译）等一帮人。他们没来前，我就和农民讲，“你们一定要留足口粮、种子，之后再交‘出荷粮’。有就交，没有不可强交。留下的粮食，不能藏在明面或容易翻出的地方，要藏就把它藏好，不能叫人给找出来，找出来就得挨打。就是挨了打，也不能乱说。”张科长他们来后我亲自领着到各屯农户去查看“出荷粮”情况。多数人家没有完成“出荷粮”。他们想要打人，我说：“打能完成‘出荷粮’还行，如果打也完不成怎么办？”他们没啥说了。我又说不是按年初的“割当数”吗？看那家欠交多少，就追要

多少，交不足再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各想办法。到县里，在村里我都说：“没有粮就是没有粮，地都涝了，还产什么粮？”开伪职员大会时，县长把我好说，说我挡道。会后有人和我说：“没有粮也不能那么说，那样说话危险！”我说：“那不行，说有粮，粮食在哪里，完了老百姓受苦啊！我这村长怎么当啊？”我知道农民没有粮，说想办法，就是把事情拖一拖。出钱买粮，老百姓哪有钱啊！我找县长不行，于是我找县公署实业科日本小川科长。我说：“大兴村遭受水灾确实不轻，农户的口粮明年有问题，种地都有困难，今年的‘出荷粮’难以完成。”请他和日本人副县长说说。日本人副县长问我：“你说的属实吗？”我说：“属实。”他又问我“你敢保证？”我说“敢保证。”他又问我“拿什么保证？”我说“剖腹。”日本人不讲起誓讲剖腹，以表忠诚，结果给减免了近1 000吨。第二年夏天，我又找小川科长，说农民现在没粮吃，有的已揭不开锅了，现在弄地有困难。我是从城里去的，又在官厅呆过多年，小川相信了我的话，说：“你写条子来领米吧。”于是我就先在村公所给缺粮户打条子，小川批后，就直接到粮栈领米，完了我同小川算总数。那时大兴村缺粮户，用小车、驴驮、担挑，整回不少，群众很满意，直到青苞米下来。那时官员间不准送礼，有特务、宪兵，一旦查出来，算行贿受贿，是犯罪，特别一些特务属子总是闻风探讯，得点情报就往上报，所以他们也不敢收礼。于是我就借去城里办事的机会，请他下小馆，共同吃饭，他到大兴去，我也请他到家中吃饭，两人关系处得很好。以后我到索格营子任村长，又给那里减免过出荷粮500吨。

“出荷粮”事过后，我就和村公所实业系的人说，今年自报的“割当数”有去年的教训，地数和产量估计都不能报高了。对农民也讲，今年领配给粮就这么一次，明年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康德9年以后年成都很好，康德10年崔宝山转来当县长，这个人象刘鸿谟，能替百姓说话，敢“抗上”，不怕得罪日本人，但他只在白城县呆了1年多。我从配给农民的白面中，给崔宝山送去两口袋，他很乐，我又给日本人副县长送一只老鹰，所以他们对我印象都很好。以后“出荷粮”虽然仍很紧，但“出荷”数都完成了，吃的也就不那么紧了。

伪满时在各村都建立协和分会，分会与村公所一起办公。协和分会除了宣传“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内容外，还经常向上级协和分会反映人们的思想动向，对大事反映，有关作物生长及收成情况等。村长兼分会会长，另有专职副分会会长和书记（都是上面派来的），村长只是挂名，他们有什么事要向村长汇报，村长一点头，他们就往上报了。兴农合作社在村公所派有驻在员，主要是反映农情，进行生产指导等。

刘鸿谟当白城县长时，去大兴村，到过四十户，到过交通窝堡。据说四十户在民国时还是一个大村呢，后来划入了苇子房。他在交通窝堡住过一宿，偏遇上有人报告一伙要钱的，叫他听到了。我对村公所的人说：“你赶快告诉他们，县长在这呢，要要就到别的地方去要！”刘洪谟听后说：“哪要钱，把他们都抓来！”并指责我说的不对，“上别的村去要钱，也没有出白城县哪！”我说：“我是村长，不是警察分所长，不管要钱。”刘县长听后更不愿意了。

为什么有人骂刘鸿谟呢？他在哪些地方不好呢？伪满康德7年刘鸿谟任白城县县长，刚刚上任就指出实业科所报的地亩数和农业收成与实际情况“不符”。本来白城县当时由于水涝实际耕地只有14万垧，他却报了20万垧，把开拓团占去的土地都给报上了。第二年的“割当数”就做多了，象春旱秋涝，粮食减产，刘鸿谟不下乡察看，却在省里大吹白城县丰收，结果

“出荷粮”比上一年多了不少，多出的只好向各村硬摊派，向种地户硬挤，挤不出来，刘鸿谟就派人下乡紧追、硬逼。人们完不成，就进行打骂。我去大兴村任职时，就听到农民的谩骂声，刘鸿谟只顾日本人那边的一头热，而不顾中国人民，所以人人都骂他是汉奸。伪满时的县长、村长以及一些科长没有在一个地方呆长的，最多3年，就得调动一个地方。刘鸿谟没呆3年就走了。

伪康德11年3月1日，我转到索格营子村，那地方日本军队多，总向地方要车要马，地方百姓拉碱土，事先必须和他们联系好，不联系好，就不让你上大岗。日本人忙于备战，每隔十天八天就来一批军用物资，从火车上往下卸东西，往大岗上运，都要地方出车、出人，最多时一天要过51辆，一个屯一辆车，并要很多人前去卸车，往北大岗上军事基地装运。村长经常的工作就是与日本军队打交道，来来往往，你找我要人要车，我找你网开一面，给予方便，每天都是这些乱事。在白城子日本军队很多，据我知道有培芝部队、国本部队、国芝部队、大岛部队、游佐部队……，有一二十个。就大岛部队是战斗部队，其它部队性质不详，平台、平安镇都有飞机场，大岗上好几百里方圆内没有人家，又是最好的靶场和伞兵练习降落的好地方。后来大部队调到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去了。游佐部队，又叫336部队，是训练军马的，这个部队我去过，其他部队很保密，有些事，不让你去，更不让知道。

伪满的各村都有一个警察分所，分所一方面维护地方上的治安，另一方面也监督行政。如果村公所与警察分所处好了，麻烦事就少，如果不对头，出事就多。有次索格营子村公所司计和助理员杀羊，一个村公所二十多人，打算大家分点，这事却让警察分所给检举到平安镇警察署，后又送到警务科。原来索

格营子有一个张某还是我的一个亲戚。这小子很坏，专搞小报告一类的事。他和助理员、司计有别扭，一见司计和助理员杀羊，违犯了统制法，就向警察分所告了密。我知道后，就向他讲：“你怎么能随便报告呢？你事前没告诉我就告密，这不是从中整我吗？”我把他说一顿，随后我坐上火车直赶县里找了崔县长，正好崔县长收到了密告信，我把情况一说，才把事情压下来。

伪满时的警察厉害，他们可使用刑罚，并好动刑，打嘴巴、踢人是经常事。如灌凉水、灌辣椒水、打鞭子，什么都干，我见过灌凉水的。胡宝山有一个姓孙的是个地主，不知道得罪哪个警察了，给整到警察署，把人放在一个长形木槽里，胸腹、膝盖都用绳子牢牢地捆在木槽上。在脚部垫上一个板凳，使头部朝下，再用一月牙形的东西卡住脖子，然后用水壶往鼻子里倒凉水，使人喘不过气来，边逼问边灌，一会儿就从鼻孔流出血来。还有打鞭子、打棍子、打皮带，是叫人在地上撅着，露出后背和屁股，往后背上打，往屁股上打，往大小腿上打。日本警察用鞭子打人最厉害，他们是用鞭子抽打人的肋条，这和灌凉水一样，人都受不了。哈尔呼吉警察署长刘孟遑，原先当过特务股长。有一次抓赌，抓着几个人，把1个人绑在车轮上，然后用脚踢，踢到小便上，把人活活给踢死了。所以在伪满时人人都怕警察，恨警察。

我在索格营子只呆1年多时间，家在白城子街里，每日早上坐轻油车去，晚上坐轻油车回来，很方便，司计和助理员也来回跑。1945年8月11日我回的家，8月12日苏军就进了白城子，以后我再没有去索格营子（镇西）。

现在提出要抢救伪满史料，对我来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年纪太大了，蜡头不高了，只有密切配合，讲出自己

所历、所见、所闻的一切人和事，做为自己的奉献吧。

(摘自《白城市文史资料》第七辑)

日伪时期长春郊区的大南村政

李子新

马殿俊 丁淑芹整理

保甲的职能

保甲制度是在敌伪建政初期，沿袭旧社会十家连坐制度而来的，十家连坐的意义是一家有事十家不安，一家违法十家受罚。保甲是警察局的下属，行政事务不多，主要任务是治安。旧社会是滥用职权的时代，保甲就是警察的帮凶，可以随意逮人。

自从1935年后，伊通县重新调整一次保甲区域，并加强保甲职员之人选，那是为了施行街村制打下基础。但在1939年伊通县施行街村制时，街村的职员是换汤没换药，仍是原保甲的那些人，所以警察官们把街村职员仍看成是他们的走卒，村警双方经常发生矛盾。

缴枪和集家

缴枪和集家是日寇侵略中国，蹂躏中国人民之铁证。日本侵略东北以后，恐怕人民起来反抗，他们首先把民间之武器（包括洋炮、大枪、土枪在内所有冒烟武器）全部收缴，集藏在县城。以后他们仍不放心，又把偏僻村落拆除，把抗日救国的组织与群众隔绝，强迫实行集家。当时执行集家命令的是伪警

察署长，他的辅佐助手是派出所长和保甲长，凡是被拆除房屋无家可归的人们，都遭受着极大的蹂躏和痛苦。

街村的成立

伊通县是在1939年2月1日，将全县保甲全改为街村的，当时大南屯是大南村公所所在地，第一任村长林子然原是林家屯甲甲长，第一任助理薛占鳌是原大南屯甲甲长，以下设庶务、财务、行政3系共有20余人。下属有大南、加官、热闹、林家、庄油坊、二道沟和房身沟7个行政区，每区置区长1人、助手2人。

大南村管辖区域，东起逐家窝堡东张申沟，西至石灰窑，东西将近30公里，南北约有15公里之多，成为一字形地域。

在未施行街村以前，保甲职员很盼望早日施行街村，他们的认为是：街村是国家的法定地方政府，是纯行政单位，能摆脱警察的统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敌伪政权中的矛盾。

加强监督管理

伪满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起所谓大东亚战争，一切物资均以军用优先，所剩无几，给老百姓平常吃的白面、豆油都列入配给之内，白面只到三节供应，在旧历年时（春节）每人只发给半公斤，豆油更少。虽然少得可怜，而商人是以挣钱为目的，对村民的饥苦很少考虑。大南当时比较大的商号，只3个，有永和公、天增福、景华新。这3家商号是经伊通县商会批准的配给品商店。

统制物资刚施行配给时，县实业科印刷大批配给品通帐发给各村，各村按户口上的姓名、人口、住址等填在通帐内，每户一本发到村民手里。到发放物品时，村民持通帐到商店直接

领取，由商店把发放的物品名称、数量记在通账上，而商店没留什么凭证，这样一来就给奸商开了绿灯。有的奸商把配给物品藏起来一部分，硬说放完了，村公所因没有核对的依据，就无法监督检查。记得1939年的旧历年（春节），每人放白面半公斤。在农历腊月卅这天晚上，有一群农民，手拎着空口袋，找到我的家门。当时我是助理，赵村长已回营城子老家过年去了，当然啦，老百姓有事就得找助理。我领着这伙农民，到配给商店了解一下情况，最后在天增福商号发现尚有存面，给这伙拎空面袋的农民照数发给。

粮谷出荷

粮谷出荷，是一个奴化名词，就是敌伪向农民强制征购粮食。1943年刚过春节尚未开始春耕前，通阳县^①就为本年的粮谷出荷召开村长会议，根据各村耕地面积及土质好坏，县实业早有调查，大南村应负担责任量是7800吨。并指示各村往各区下达数字时要加10%的机动量。意思是，战时体制的粮谷出荷是属于军事物资，是一粒不能少的，如无机动量之准备，倘若某户遭受突然灾害而供不出去，村长只是目瞪口呆，县长也是束手无策。怎能完成任务呢？因此各级必须都加一点，留有余量，以免到时完不成“出荷”任务。

当时我坚决反对这种作法，认为这等于向老百姓说谎话，是一种欺骗性的办法。在县署为粮谷出荷召集街村长会议席上，我对加机动量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而未被采纳。为了避免大南地区大爷、二爷^②拣便宜和造成“出荷”苦乐不均的后果，大南村决不能按县里指示加机动量。

^① 通阳县即今吉林省伊通县与双阳县一带地域。

^② 旧社会对农村当地有钱有势的人习惯称为“大爷、二爷”。

就在检查秋后青苗时要公平认真，只要在秋收未割之前，大家互相公平无私的验地，使各户心口皆服，才算把工作做到家了。

门 户 费

敌伪最后摇摇欲坠时期，加紧苛捐杂税。约在1942年又增加一项门户费，根据纯收入计算收费，类似人头所得税。

县财务科召集街村财务系人员到县集中学习计算方法。由各户自己申报收入额，并各种收入有各种不同的纳税换算率，结出纳税额就有出入。例如甲、乙二家，甲家不如乙家生活好，但甲家门户费的纳税额例比乙家高，不用说老百姓有意见，就掌管收门户费的财政人员也不敢承认公平合理。

三位一体

敌伪时期的伪中央政府和协和会中央本部以及兴农合作社是三个性质不同的机构，但人员经常互相调动，所谓人事交流。在伪满最后几年，基层单位根据地方情况，施行“三位一体”，就是在同一地区的村长、协和分会长、兴农合作社办事处长都由一个人担任，但不是上级一声令下，而全县同时照办。通阳县已有三分之一的村已施行三位一体制以后，于1943年大南村才施行三位一体。

劳工的供出

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中，人力、物力全从中国人身上出。1941年第一批劳工，大南屯摊了20人，是通阳县警务科直接给各警察署下命令强制征集的。抓走所谓无有正业的“浮浪”分子，县里来的大汽车，大南警察署派人押送到县。这批劳工走

后不多日子，就有悄悄地跑回来了。

到了1942年通阳县署就成立了动员科，科内有劳务股，各村就设置了国兵民籍，后改为奉公系，该系内部有管劳务专人。并令各街村按户口凡18岁至45岁的男子全部注册，建立劳工台帐。以家庭经济情况而定供出之先后，供出期限大致是6个月，上面指示不许雇人代替，实际雇的劳工约占1/3以上。

劳工去处大部分是矿山、部队仓库，有的去国境虎林、虎头，也去过驻在伪都——新京的日本军100部队和60部队的仓库、蛟河煤矿等地。

据反映全是拿中国人当牛马之不如，劳工死亡不断出现，在1942和1943两年中，大南村劳工死亡有十余人，通过了解，死因大部分是活太累，吃的不好，住的地窖子，得病不给治疗。

我曾去过蛟河煤矿慰问劳工，直接目睹了虐待劳工的种种罪行。1943年我出席吉林省协议会时，我以通阳县协议员代表的身份，控诉矿山虐待工人不如牛马，长达三千多字控诉词，在叙述劳工回来的悲惨情景时，各县代表以阵阵掌声表示支持和同情。最后得到伪当局很简单的解答，只用6个字，“今后妥为善处”而草草了之。

参加伪国务院一次会议

1944年春，通阳县公署通知我到县接受县长面谕，是让我去伪国务院，代表通阳县参加春耕动员大会，并给我一张国务院礼堂的入场券。我到伪国务院礼堂稍迟一点，由工作人员把我领到通阳县的代表席上，我落座后才看到桌上三角标牌有通阳县字样。参会的全员也不过200人，讲台上平列两张桌，左

边是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右边桌是一个关东军上校参谋长^①，身边站着一名翻译，张景惠先发言，他手举一张讲话稿是他秘书写的，据传说写完稿给他念几遍，他虽不识字但他能记住，表面看他端着稿纸往下讲，实际他是手捧稿纸往下背诵。张景惠讲话还很流利，就是口头语太多，说一句话得带两个“奏么”，我好奇地给他数着，他讲完这段话，说了一百二十多个“奏么”。

伪总理讲完，接着就是右边那位参谋长讲，因为他是军人，讲话的风度比张景惠精神得多。听完讲话就散会，由几辆大客车把参会的人们接到伪国务总理官邸。这是一所新的建筑物，室内设备很款式，全是单人沙发。我们到以后，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日本人）也来了，武部的中国话说的很流利。等张景惠来到官邸时，有人喊“全体起立”，大家（包括武部六藏在内）都很礼貌地站起来，从表面看，武部还很恭维张景惠的。接着就聚餐，饭后通知明天各县代表全体去鞍山参观钢铁厂，到火车站集合，然后各回到各自的住处。

第二天乘上火车的人没有开会的人多，只有百余人，只坐一节车厢。火车过铁岭时，张景惠对大家讲：“我青年过绿林生活的时候（他手指南面的群山）经常出没那些个大山里”，他又说：“我们投降到奉军以后，又和那大山里的匪徒打仗，大家都听说过吧？兵打乱石山嘛。”

到鞍山钢铁厂也没看到什么表演，先由一个日本人在礼堂里按图纸讲讲生产各部位，以后又换个人讲讲生产原钢的过程，下午乘上火车直接返回伪都新京，两天会议结束，第三天各回各县。

（摘自《长春郊区文史资料》第三辑）

^① 1944年春，关东军参谋长为笠原幸雄中将。而且日军军衔为将佐尉，无上校衔，故作者回忆有误。